

## 蔣經國與胡適： 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 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黃克武

### 摘要

蔣經國生於1910年、留學俄國，胡適生於1891年、留學美國，二人分屬不同世代。在思想上蔣經國因長期負責情治工作，重視群體安危，主張採行俄國式的「一黨專政」，至晚年才有所改變；胡適則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畢生強調自由與人權，主張美國式的民主。本文用日記、報刊、政府檔案等史料探討1949至1962年間兩人的交往、互動。在表面上，蔣經國受父親指示以父執輩禮遇胡適。然而在日記中，他卻和父親一樣大力批判胡適，視其為「政客作風」、「狂妄」、「無人格與卑賤」、「反動」、「反政府」等。他並利用《青年戰士報》公開批胡適，以維護軍中思想的「純正」。此一「表裡不一」的矛盾，反映蔣氏父子既需要胡適、又厭惡胡適；既需要美國的支持，又對美式民主深具反感的心理。在此對抗的過程之中，蔣經國卻逐漸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衝擊，「表」的一面對「裡」的一面逐漸產生作用。這一過程也可以說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之下，「民主的假戲」變成「真做」。胡適死後，中華民國在他的領導下，推動經濟改革、民主化，最後終於促成了政治轉型，實現了胡適的理想。

關鍵詞：蔣中正、蔣經國、胡適、民主化、《青年戰士報》



# **Chiang Ching-kuo and Hu Shi: Encounters between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Liberal Democracy Prior to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Max K. W. Huang\*

## **Abstract**

Chiang Ching-kuo was born in 1910 and studied in Russia, while Hu Shi was born in 1891 and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belonged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Chiang Ching-kuo was responsible for Taiwan's intelligence work for a long time and thus stressed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public. In ideology, he advocated the Soviet-style “one-party dictatorship” until his final years. Hu Shi, on the other hand, spent his life upholding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promoting American-style liberal democracy. He was a reknown scholar and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men from 1949 to 1962 using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journals, newspapers, and government records. On the surface, Chiang Ching-kuo was instructed by his father to treat Hu Shi with the courtesy reserved of an elder. In his diary, however, he shared his father's criticism of Hu, describing him as of “politician style,” “arrogant,” “dishonorable and lowly,” “reactionary,” “anti-government,” and so on. He also used the *Young Warrior Daily* to attack Hu Shi publicl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ought control in the military. This contradiction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 Chiangs hated Hu Shi yet needed to court him. Similarly, they needed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had a strong aversion to American-

---

\*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style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these interactions Chiang Ching-kuo gradually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and democratic ideas, and his “outward performance” gradually eroded his “inner beliefs.” This process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the Chiangs' “play-acting at democracy” evolving into a genuine effort to become on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U.S.-Soviet Cold War. Long after Hu Shi's dea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Chiang Ching-kuo's leadership adopted economic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eventually leading to a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realized Hu's life-long ideal.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Chiang Ching-kuo, Hu Shi, democratization, *Young Warrior Daily***

# 蔣經國與胡適： 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 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黃克武\*\*

## 壹、前言：兩種模式的競爭

以往學界對二戰後臺灣政治權威與自由派知識分子之關係的研究多注意到蔣中正總統與胡適、雷震、殷海光、徐復觀等人的關係，而較少注意蔣經國所扮演的角色。<sup>1</sup> 這主要因為蔣經國往往隱藏在父親的身影之後。然而蔣經國的角色十分重要，一方面因為蔣中正總統的情資多來自蔣經國，而且很多事情由蔣經國經辦，另一方面他的觀點影響到他父親的許多決策。批評者甚至指稱蔣經國所領導的「太子派」、「乃台局之禍患」、「蔣經國為違憲連任之首要人物」。<sup>2</sup> 因此

---

\* 作者感謝劉季倫教授與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指正。本文為筆者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冷戰時期港臺自由主義的興衰：以《自由中國》與《自由人》及其互動為中心（1949-1960）」（計畫編號：111-2410-H-001-079-MY2）部分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0日收稿；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2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sup>1</sup> 例如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年）；金恆緯，《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7年）；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陳昭瑛，《徐復觀的政治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

<sup>2</sup> 〈黃宇人致雷震函〉（1960年5月2日），《雷震秘藏書信選》，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0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430。

了解兩蔣父子與胡適等知識分子的關係，尤其是其中蔣經國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更深入認識威權統治者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互動，反映出雙方既「有志一同」又衝突矛盾的複雜情境，也顯示國民黨的最高領導階層在內心世界與外在行為之間的嚴重「分裂」。本文將從這個角度分析1949年之後蔣經國與胡適的交往、互動，及其意義。

近年來由於「蔣經國日記」的公布（2020年2月3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以及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的開放，為歷史研究帶來許多新的線索，也使「蔣經國的臺灣時代」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sup>3</sup> 林孝庭的書利用新公布的「蔣經國日記」與相關史料，介紹1949至1988年之間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呈現了二戰後中華民國在臺灣各方面的發展。筆者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之中評介此書，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sup>4</sup> 蔣經國與當代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推動各項建設，促成經濟發展，同時也扮演了一個從「威權統治」到「解嚴」、「民主化」過程之中的關鍵角色。今日臺灣民眾能享受自由、民主、安康的生活，蔣經國居功厥偉。

林孝庭的書是對蔣經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兩岸與對外關係等課題的一個全面性的研究。其中有幾個與本議題相關的特點，這些特點與其他人的觀點也相呼應。第一、他並不重視蔣經國與胡適的關係，以及胡適在「蔣經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書中只有在討論「雷震案」的背景時談到：

---

<sup>3</sup>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21年）。另外兩本利用「蔣經國日記」所撰寫的書是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黃清龍，《門裡還是門外？從蔣經國日記再探孝嚴身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2年）。此外林孝庭還有幾篇利用蔣經國日記所寫的論文，例如林孝庭，〈蔣經國的一九六四：日記中的國事與家事〉，收錄於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https://presidentialcck.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article/PATA00024>（2022/11/25點閱）。林孝庭，〈蔣經國與宋美齡關係再探究——以《蔣經國日記》為中心〉，《臺灣歷史研究（北京）》，2022年第4期，頁73-86。

<sup>4</sup> 黃克武，〈評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4期（2021年12月），頁137-145。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當時不少政壇重量級人物，如陳誠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等，都或明或暗地鼓勵著這些反對派人物，讓兩蔣父子有所顧忌。美方解密檔案揭示，一九六〇年秋天胡適向美大使莊萊德透露，他已和高玉樹、李萬居等人秘密會晤，晤面之前胡適曾向陳誠請示機宜，陳誠透過胡適告誡高、李等人「不要衝太快」，應設法爭取民社黨與青年黨等外省政治團體的支持。美大使則警告胡適，儘管華府認為國民黨正致力於建立一個較為開明的形象，但蔣介石絕不可能坐視反對黨公開成立，挑戰其領導威信，在美方看來，這是老蔣身為最高領導人一道不可被跨越的政治紅線。（頁334-335）

除此之外，全書不曾提到胡適。

第二、林孝庭從日記之中刻畫了蔣經國「內心世界」的兩面性格，而其思想的核心是維繫國民黨的統治。作為情報頭子，他對敵人與「叛徒」十分兇狠，而這是出於對本身「愛國」之舉深具信心，而在外表上，他又有親民愛民之慈悲，他最關心的是人民的福祉。在外交上，他痛恨美國人的強硬作風，干涉臺灣政治、軍事與外交，又不得不與之周旋。在政治措施方面，他在「開明」與「保守」之間擺盪。他肯定民主化、本土化是必走之路（如拔擢謝東閔、張豐緒、林洋港，安排李登輝接班），但「又缺乏民主的DNA」（蔣經國在日記中常質疑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他說「難道選舉才是民主嗎？」、「選舉勞民傷財」、「各種選舉美其名曰民主，或謂為民服務，而事實上則為名利而爭也」）。這一描繪與港臺第三勢力對他的批評相互配合。他們認為蔣經國缺乏民主素養，主張「家天下」與「一黨專政」。例如黃宇人認為他「當年在俄國受訓十年，習染既深、而在臺灣的種種表現，又復向共黨亦步亦趨」。<sup>5</sup> 總之，他時時惦記著如何維繫承襲自父親的國民黨統治。

第三、上述的「兩面性格」涉及蔣經國一生的一個關鍵的轉變。眾所周知，在蔣經國掌握大權之前（以1965年元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從幕後走向臺前為分水嶺），他在父親的栽培下，曾長期負責情治工作，

<sup>5</sup> 〈黃宇人致雷震函〉（1960年5月2日），《雷震秘藏書信選》，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0冊，頁429。

是一位「情報頭子」，具有強烈的「獨裁」的作風，1950年代之後許多整肅情治單位內的反對勢力（如「杜長城案」槍斃21人），<sup>6</sup> 以及白色恐怖的案件（如柏楊的「大力水手案」）都與他有關，甚至有人指控他是「白色恐怖的元凶」。<sup>7</sup> 然而從1970年代擔任行政院長（1972-1978）與總統（1978-1988），到他過世之間，他的形象有所轉變。今日在大多數臺灣人的心目中，蔣經國是一位生活儉樸、體察民瘼、同情弱勢、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的好總統。2019年10月《遠見》雜誌所做的民調，在「哪位總統對臺灣貢獻最大」的問題中，蔣經國以38.7%領先其他總統，拔得頭籌，超過李登輝（13.6%）、蔡英文（7.9%）、馬英九（6.1%）、陳水扁（3.2%），也遠遠超過他的父親蔣中正（2.4%）。<sup>8</sup> 在筆者所主持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訪問了長期追隨蔣經國的核心幕僚、侍衛長、武官、醫官、安全參謀官、侍警衛人員、駕駛、主廚等32位人士）也可以看出蔣經國雖貴為總統，卻瞭解權力的節制，而時時克制自己。他反覆強調：蔣家人不繼任，要終結「家天下」。風燭殘年時，蔣經國能夠認清大勢，明知國民黨可能丟失執政權的情況下，依然決定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著手終結威權統治與強人政治，並開啟民主化進程。<sup>9</sup> 簡單地說，他是一位「民主先驅」。

上述的第三點的「轉變」，及其背後的原因值得較深入的討論。首先，蔣經國從「『一黨專政』的舊格局中脫離出來，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受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稱讚。例如余英時曾說：

<sup>6</sup> 有關此案林孝庭的書中曾約略提及（頁46-47），張友驊的近著《綁架蔣經國！？情治首長的背叛與奪權之爭》（臺北：暖暖書房，2022年）對此案的來龍去脈有詳細的解析。他並從杜案開始詳細分析蔣經國如何與毛人鳳鬥爭，在1956年開始建立情報界的龍頭地位，又在1962年「完成情治系統一元化的指揮」。

<sup>7</sup> 例如二二八受難家屬王文宏認為，蔣經國的情報工作造成二二八屠殺悲劇、更是白色恐怖的元凶。見謝孟穎，〈「蔣經國就是白色恐怖元凶」受難家屬揭歷史黑幕：所作所為並非為了臺灣〉，收錄於「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202894?page=1>（2022/11/25點閱）。

<sup>8</sup> 羅立邦，〈遠見民調「哪位總統對臺灣貢獻最大」他遙遙領先、第二名看不到車尾燈〉（2019年10月25日），收錄於「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871975>（2022/11/14點閱）。

<sup>9</sup> 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蔣經國晚年是很不容易，能有這麼大的轉彎，必須要承認他。我對蔣經國的印象一直不好的，很大原因是他是蔣介石的兒子，父傳子我不能贊成。他最早是要把自由派勢力幹掉，壓迫《自由中國》雜誌他是有分的，早期他是民主的敵人，但是後來慢慢覺悟，能有改進，就值得稱讚。

1987年國民政府正式解除戒嚴令，1988年蔣經國逝世——蔣經國在逝世前毅然決定解嚴並開放黨禁和報禁是他個人永留史冊的一件大事，而他的逝世則標誌著國民黨「強人」時代的終結。<sup>10</sup>

余英時認為臺灣相繼出現政治、經濟奇蹟，和蔣經國的「慢慢覺悟」，改變領導方向是絕對分不開的。

林孝庭的書中沒有特別去解釋蔣經國從「情報頭子」到「民主先驅」的轉變是如何形成的。黃清龍的書則比較針對此一議題。<sup>11</sup> 綜合各方面的討論，筆者認為此一轉變可能涉及以下幾個多元的因素：

第一、蔣有深刻的「自覺」，追求自我超越，不斷進步。1971年5月7日的日記最能反映此一心態（林孝庭，頁352）。他理解到今日的政治是現實的，已非二十年前初來臺灣及推動「白色恐怖」時的環境可比擬，他寫到：

必須致力於改革政治，以安人心。此為安內之急。……新舊兩代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可能發生嚴重的後果。總之，自己如果不從事改革，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當政者雖有一番好心，倘使沒有積極的行動相配合，老百姓還是要反對政府的。今天是現實的政治。

此時蔣經國開始注意到在臺灣新舊二代、「外省人」與「本省人」、政府與人民的緊張與衝突，但他沒有說階級矛盾（此時或許尚不明顯）。對他而言，1970年代時新舊兩代的矛盾與本省、外省的地域矛盾是社會衝突的核心，而推動「改革」才能「安內」，而避免「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對蔣經國而言，改革有許多可能，然而其基本的方向是走向「本土化」與「民主化」。

<sup>10</sup> 顏擇雅編，余英時著，《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新北市：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22年），頁96、252。

<sup>11</sup>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56-274。

第二、蔣經國地位的改變。1949-1969年間蔣經國是主管情治工作的頭號人物。1960年代中期開始，他從幕後走向臺前，同時他從1970年代以後，多次下鄉巡視，又結交臺籍友人、深入了解地方民情。這種地位的改變與觀點的調整使他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臺灣的將來。

第三、外在情勢的變化，如美國對臺政策改變所形成的壓力、大陸鄧小平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兩岸競爭等。

第四、反對勢力的逼迫：臺灣內部自由主義者與港臺第三勢力對兩蔣的批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所感到外界批評他「家天下」的壓力主要是張發奎、顧孟餘所領導的「第三勢力」所造成的。因為有港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動員，使「民主」而非「傳子」才具有政治的合法性。<sup>12</sup>此外，臺灣的「黨外運動」也很重要，如美麗島事件所帶來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誠如吳乃德在《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所指出的，臺灣民主運動歷經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後不退反進，獲得更多民眾同情與支持、更加澎湃洶湧，在此情況下，蔣經國無法繼續強硬鎮壓，只能選擇妥協，臺灣民主運動持續不懈成為民主化主要的動力。吳氏斷言「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臺灣民主」。

第五、黃清龍曾指出「省籍問題導致的威權軟化」。他認為本省人占臺灣人口的多數，使少數統治的國民黨當局，為求「長治久安」，不能迴避「本土化」的問題。<sup>13</sup>

第六、蔣經國的決策受到周遭人物的影響。例如王作榮、楊國樞、余紀忠等人的角色，<sup>14</sup>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關鍵人物值得仔細分析。

第七、除了上述幾點之外，筆者特別指出一個結構性的因素。誠如林孝庭所

---

<sup>12</sup>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

<sup>13</sup>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59-260。

<sup>14</sup>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66-267。

說蔣經國雖有「民本的DNA」，卻不具備「民主的DNA」，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中華民國具有「民主的DNA」。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的憲政架構是使蔣經國走向臺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的因素，而中華民國所具有「民主的DNA」，不但是由憲政體制所維護，也與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在《自由中國》所堅持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等價值，以及美國為首之民主陣營的支持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再者，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也表現在臺灣從1950年代開始就有「地方選舉」之上，執政者藉此以取得「統治的正當性」。然而歷年選舉的「制度化」也逐漸衝撞、軟化了威權統治。<sup>15</sup>

筆者認為在1950至60年代的二十多年間（甚至可以說到解嚴之前），為了生存並進而反攻大陸，臺灣的政治選擇處於兩種模式的競爭。胡適所代表的是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模式；蔣氏父子則基於傳統「民本」的愛民理念，採取威權統治，與以黨領軍的「政工制度」，屬於俄國式的「一黨專政」模式。<sup>16</sup> 此種「一黨專政」模式在臺灣受到三種勢力的抨擊，一、駐臺的美軍顧問團；二、以孫立人、吳國楨為主的親美的政治、軍事人物；三、胡適、雷震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黨外運動」的支持者）。蔣經國與胡適的關係可以放在上述模式競爭的架構下來理解。

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下，本文擬透過「蔣經國日記」、國史館藏「蔣經國資料庫」、中研院近史所藏胡適資料庫等史料，釐清蔣經國與胡適的關係。筆者認為1949至1962年間，蔣氏父子的威權統治與胡適所堅持的自由民主價值的相互激盪，使蔣經國逐漸成長，他在與胡適思想（以及胡適的後繼者）的對抗中逐漸認清了民主的意義，以及民主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而促成後來的轉變。歷史的吊

<sup>15</sup>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66-261。

<sup>16</sup> 此一俄國模式源自孫中山自1920年代開始的「聯俄容共」的政策，此後國民黨轉變為一個「準列寧主義的政黨」。參見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1949年到臺灣之後，為了牽制美軍對臺灣的影響，蔣中正還聘請日本軍人組成的「白團」從事軍政重整。白團除了在軍事教育方面有所影響，還有兩個重要的成就，一是訓練了一支接受日式訓練的32師成為模範師，一是設計了「總動員體制」。見野島剛，《最後的大隊：蔣介石與日本軍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221-230。

詭是：在胡適生前，蔣經國在父親的指示下表面上對胡適「友善」而尊敬，私底下卻在日記中大力批評胡適，視為「政客作風」、「狂妄」、「無人格與卑賤」、「反動」、「反政府」等。在胡適死後，中華民國在他的領導下，推動民主化、促成政治轉型，最後終於實現了胡適與雷震等人的理想。1949年之後在臺灣的政治實踐之中，「俄國模式」的「一黨專政」最終被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模式所擊敗。

## 貳、胡適相關史料中有關蔣經國的記載

1959年6月14日，一位曾任《公論報》與《聯合報》的記者袁方，請胡適為他的新書《記者生涯》的封面題字，胡適答應了他的要求。幾個月後胡適收到書，他對書中一段有關蔣經國與他的描述很不滿意。根據胡頌平的記載：

先生翻開袁方《記者生涯》（百〇二頁）上有這樣一段的記載：胡氏在前，蔣氏在後。當蔣氏發現胡氏時，便一面加快腳步，一面喊著：「胡先生、胡先生。」胡氏回頭一看：「啊，蔣主任。」於是兩人邊走邊談……他們的談話卻平常而輕鬆。……先生指著「胡先生，胡先生」這句話說：「經國一向喊我『先生』的，先生上面不加『胡』字，我從沒喊他『主任』的。這些記載就不正確了」。<sup>17</sup>

由此可見「經國」、「先生」是兩人彼此的稱呼。從年齡上來說，1891年出生、留學美國的胡適比蔣中正（1887-1975）小4歲，而比留學俄國、且娶俄國女子為妻的蔣經國（1910-1988）大19歲。蔣經國與胡適在年齡上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世代，在思想上則分別受到俄國與美國文化的影響。兩人見面時，蔣經國尊稱胡適為「先生」，而胡適則逕稱其名，而不像其他人稱蔣經國為「主任」或「教育長」。<sup>18</sup>

<sup>17</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39。

<sup>18</sup> 蔣經國曾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因此很多屬下稱他為「主任」。又他曾任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此時的學生稱他為教育長。例如楚崧秋與蔣經國單獨見面時一直稱他為「教育長」。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楚崧秋先生訪問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蔣胡兩人在1949年前在中國大陸即曾見過面，<sup>19</sup> 不過胡適沒有留下任何紀錄。在胡適的日記之中他第一次親筆提到蔣經國是在1950年9月，當時胡適寓居美國。9月19日胡適的〈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一文在 *Foreign Affairs* 刊出，不久次子胡思杜（1921-1957）就在報章上攻擊胡適。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文中認為胡適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他未回到人民中間去之前，他將永遠是人民的，也是我自己的敵人」。胡適猜想這與他所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有關，「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新聞人物』，此當是共產黨已得我發表長文的消息之後的反攻」（1950年9月24日）。不久英文報刊轉載此一消息。胡適的朋友看到之後立即將此一剪報寄給他。其中他的朋友吳南如（1898-1975，中華民國外交官）聯想到蔣經國也曾公開攻擊他的父親蔣中正，胡適在日記中寫到：

吳南如來信說，蔣經國在蘇俄時，介石先生曾令大使館轉交一函，要他早回國。經國在紙上寫了幾句話回答，略說「蔣介石是人民的敵人，故也是我的敵人。不願再見他，除非在戰場上！」那時南如是駐蘇代辦。<sup>20</sup>

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頁264。

<sup>19</sup> 蔣胡兩人最早的接觸可能是在1947-48年間。1947年8月28日〈蔣經國致蔣中正函〉提到「胡適先生來信……敬呈大人核閱」。見「蔣經國函蔣中正閱讀魏德邁之聲明後甚為憤怒覺此既無理又失禮另呈胡適之來信夏令營學員報告一件及所編印之對青年軍訓詞集一本」（1947年8月28日）〈蔣經國家書（三）〉，《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40700-00003-034。1948年4月底，胡適赴杭州，經國曾奉父命請周象賢市長「善為招待」。「蔣經國電周象賢奉主席蔣中正諭請善為招待日內來杭之胡適」（1948年4月23日），〈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38-083。1948年6月25日胡適曾請蔣經國將一封信轉致蔣中正，信中談到東北與平津的狀況。蔣經國將原稿重新謄寫一份，才交給父親。「蔣經國函蔣中正轉陳胡適信件」（1948年6月25日），〈蔣經國家書（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40700-00004-018。1949年3月9日蔣中正日記：「指示經兒赴滬應辦各事……便訪胡適先生也」（藏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後蔣經國依父命，赴上海訪胡適。蔣經國的《滬濱日記》也記載：「今天在報紙上發表了關於撲滅黑市的嚴厲辦法，但是並沒有見效，一切都在做黑市買賣。這是非常可以憂慮的現象。……上午訪胡適和徐道鄰兩位先生」（1949年10月16日）。「蔣經國撰滬濱日記」（1948年8月19日），〈蔣經國演講稿（十八）〉，《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18-002。

<sup>20</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第8冊，頁513-514、517、520、522-527。

這是胡適日記第一則有關蔣經國的記載，顯示他和蔣中正一樣，都曾受到兒子的公開批評。他認為這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sup>21</sup>

胡適在日記中再次提到蔣經國是在1952年1月1日。胡適回憶去年的重要事情，除了寫了3篇英文論文之外，就是寫了幾封重要的信：

稍有關係的通信是為了汪漢航（振寰）被拘禁的事，寫的三封信：1. 寄吳國楨、陳雪屏、蔣經國；2. 寄國楨、雪屏；3. 寄《自由中國》。我的信不但做到了汪君的保釋，並且間接的引起軍法案與司法案的劃分，並且引起「自由中國有無言論自由」的爭論。<sup>22</sup>

任育德的書對此事的原委有詳細的描述。<sup>23</sup> 1951年6月18日，胡適的堂外甥汪振寰（1900-？）因「非法套匯」被實行金融管制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拘留50多天。胡適得知之後立刻寫信給吳國楨（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陳雪屏（臺灣省教育廳廳長）與蔣經國（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負責情報治安，胡適認為「軍法處」由他管轄）加以營救。<sup>24</sup> 信寄出之後，他讀到《自由中國》上的幾篇文章，立刻又寫了另一封信給陳雪屏與吳國楨，再做解釋。胡適說明此一案例並非孤例，而與幾個月前《自由中國》的兩篇社評，〈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第4卷第11期，1951年6月1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第4卷第12期，1951年6月16日）所討論的現象是相同的議題。因為此一狀況而受害的人「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人之數，我的外甥不過此三百人之一而已」，「根本毛病在於把三項金融罪都交給有司法審判權的軍事機關審判，而破獲一案，告

<sup>21</sup> 胡適，〈共產黨統治之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https://www.hushihevent.com/%E8%83%A1%E9%81%A9%E7%9A%84%E8%A6%8B%E8%A7%A3>（2023/1/5點閱）。

<sup>22</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663。

<sup>23</sup> 參見任育德，《胡適晚年學思行止研究（1948-1962）》（臺北：稻鄉出版社，2018年），頁47-98。

<sup>24</sup> 「胡適致陳雪屏、吳國楨、蔣經國函」（1951年8月11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內文件（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0053-050。此封信與下封信並未被收入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密者得獎本案款的百分之三十，承辦機關得獎百分之三十五」。他並請陳雪屏將此信轉給蔣經國：

雪屏：今日仔細想想，此事必須使經國知道，故請你將我今日寄的第一信與此信都給經國一看。此事似宜報告辭修院長，不可苟且容忍，將來或貽誤大事。適之<sup>25</sup>

接著胡適又將此事告訴雷震，請他在《自由中國》之上聲援。他並表示要「辭去發行人」，「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此信刊登在第5卷第5期上。<sup>26</sup> 陳誠（行政院長）看到此信之後感到事態嚴重，他在9月14日寫信給胡適，表示「設穿誘民之舉，違論計不出此，亦為情理法之所不許，更非政府之所忍聞」，並承認政府在執行時可能有所疏失。同時，他亦表示堅決支持「先生遠道諍言」與「自由中國之言論自由」。這一封信在《自由中國》第5卷第6期刊出。<sup>27</sup> 其後此事順利得到解決，事後汪振寰即移民美國。胡適的策略是兩面進攻：一方面寄信給兩位主管此事的官員（吳與蔣），與一位好友（陳雪屏），並請陳雪屏轉告陳誠；另一方面他又利用《自由中國》的輿論力量，呼應「政府不可誘民於罪」，甚至表態要辭去發行人以為抗議。胡適同時採用這兩個策略應是此事得以妥善解決的關鍵原因。<sup>28</sup>

胡適日記之中再次出現蔣經國要到1952年11月19日-1953年1月17日訪問臺灣之時。這是他在1949年後首度應臺大與師大之邀赴臺講學。出發前，10月29日，胡適收到雷震的信，告知《自由中國》苦撐3年，不但財政上告急，且「誹謗中傷則紛至沓來」。例如最近第7卷第8期刊登了徐復觀批評救國團的文章，<sup>29</sup>

<sup>25</sup> 「胡適致吳國楨、陳雪屏函」（1951年8月11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內文件（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0053-051。

<sup>26</sup> 胡適，〈致本社的一封信〉，《自由中國》，第5卷第5期（1951年9月），頁4。

<sup>27</sup> 陳誠，〈陳院長致胡適之先生函（1951年9月14日）〉，《自由中國》，第5卷第6期（1951年9月），頁4。

<sup>28</sup> 胡適在1954年反駁吳國楨時，曾以此一事件說明臺灣有言論自由。

<sup>29</sup> 徐復觀，〈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自由中國》，第7卷第8期（1952年10月），頁10-11。

蔣經國看到之後「認為我們與他過不去，不應於此時發表此文」，因而表示「震怒」。由此可見雜誌經營之困難，他甚至告訴胡適在此惡劣的情境之下「不勸先生返國的」。<sup>30</sup> 兩週之後，胡適仍毅然踏上赴臺之旅。這一次訪臺，胡適除了在臺大、師大做系列的學術演講外，曾在全臺各地演講「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等大家所關心的課題。<sup>31</sup> 每一場演講都吸引數千人到一萬多人參加，可見胡適的魅力。其中聲勢最大的一場是在11月30日於臺北「三軍球場」所舉行的演講，現場有超過1萬人的聽眾，還有一些人有所顧忌，擔心以實名登記索取入場券會留下記錄，因而選擇在收音機旁收聽現場廣播。<sup>32</sup>

在這一次訪臺期間，胡適曾多次與蔣氏父子見面。第一次是11月19日，蔣經國奉父命至機場迎接胡適。11月22日，胡適去見蔣中正，面交蔣宋美齡託他帶回來的信件與禮物。<sup>33</sup> 12月22日在新竹「上午，蔣總統邀胡適陪同檢閱軍隊。1953年1月10日「是晚七時，蔣總統邀宴先生暨數名教授十餘人」，蔣經國也在座。<sup>34</sup> 1月16日，在離臺返國前一天，胡適曾在臺北與蔣中正總統一起吃晚飯。在日記中胡適寫到：

蔣公約我晚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說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sup>35</sup>

<sup>30</sup> 〈雷震致胡適函〉（1952年10月29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33-34。

<sup>31</sup> 胡適，〈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1952年11月30日）〉，《自由中國》，第7卷第12期（1952年12月），頁6-9。

<sup>32</sup> 徐永昌1952年11月30日記載：「昨日李杏村云，胡適之受社會人士敦請，將在三軍球場作公開演講，發入場券之所有數處之多，渠往某處索入場券，有好友勸其勿索，謂你在收音機傍亦可聽得，何必親往，此種券必須書名當局者，按券登記，以規親胡趨勢云云。」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96。

<sup>33</sup> 「蔣中正電宋美齡：託胡適帶來之函及物品已接到，甚快慰，如病情未痊，不必於結婚節前回臺，但望聖誕節前趕回團聚」（1952年11月22日），〈蔣中正致宋美齡函（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40100-00007-017。

<sup>34</sup> 〈總統昨晚邀宴胡適等名教授〉，《青年戰士報》，臺北，1953年1月11日，版1。

<sup>35</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3。胡適在此次談話之中究竟有沒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日記中特別指出在臺灣應該有人能批評彭孟緝、蔣經國與蔣中正。有趣的是在蔣中正日記中沒有記載胡適談到臺灣沒人敢批評蔣氏父子的一段，只籠統地說「晚課後，約胡適之先生單獨聚餐，談話二小時餘，對余個人頗有益也」、「保安司令部與特務人員之作威，令人不敢言」，而且他仍然十分尊敬胡適，認為胡適「為余生平之誼友」。<sup>36</sup> 隔日，胡適離開臺灣，蔣經國再次奉命去機場送行。胡適在日記中寫到：「午後一點到飛機場，送行者有百人左右。王亮疇、陳辭修、張道藩、王雪艇、蔣經國，……都來送。楊秘書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別之感。我十一月十九到臺北，共住了六十日。」<sup>37</sup> 這一天的日記之後附了兩篇胡適離臺的報紙報導，其中一篇是夏簡所寫的〈在臺北送胡適〉，文中描寫蔣經國送行時「以父執輩禮敬胡」的情景：

一月十七日，臺北微雨，松山機場上從早到午，陸續擠滿了一群人，他們是不期而遇的來，送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書生。這個書生，便是為民主

---

有提到「無一語批評蔣總統」，還是吳國楨在與胡適談話之後，他紀錄胡適所說「你告訴我你跟委員長在『日月潭』的談話。你對他說臺灣沒有言論自由，因為沒有一個人敢批評蔣經國跟彭孟緝——兩個特務頭子。你說你因為太客氣了，以至於沒有把委員長也列於其中」。江勇振因而誤會為1月16日的談話是在日月潭，並質疑「究竟胡適是否當著蔣介石的面說了今日臺灣無言論自由，因為沒有一個人敢批評蔣介石這句話？不是胡適說謊，就是吳國楨聽錯」。見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733-734。實際上，就地點而言，根據蔣中正的日記，在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之間胡適曾在日月潭與臺北都曾與蔣會面。12月9日，蔣飛抵臺中，「下機換車，十三時到日月潭」，此後的幾天他在日月潭。12月11日與13日他曾與胡適見面，11日「胡適來此遊覽，招待及聽取其報告，約談十五分時乃寢。不料寢後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時服藥後亦不奏效，苦痛極矣，此乃為胡之言行或為美國近情所致乎。五時方入睡」，我們不知道兩人談話的具體內容，但顯然此次交談對蔣衝擊不小。13日，早上「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台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進午膳後別去」。至於1月16日在臺北的談話，胡適日記之中有詳細記載。吳國楨的信應該是把日月潭與臺北的兩次談話混在一起，也可能胡適在日月潭與臺北的幾次見面都提到類似的內容。

<sup>36</sup> 《蔣中正日記》，1953年1月17日。

<sup>37</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4。

自由奮鬥了四十年，到處散播著「自由」種籽的胡適之先生。……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蔣經國先生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和適之先生親切的握手。「我代表父親給你送行，」蔣說。「我不敢當，不敢當，謝謝謝謝，」胡答。經國先生垂手立在胡先生身邊，以父執輩禮敬胡。「昨晚上在官邸談得很痛快，我看到了你的孩子滿聰明的。」（註：總統於胡氏去國前夕，在官邸與胡長談，並共進晚餐。十七日晨，蔣經國復送鮮魚一尾，為胡氏佐餐。）一群攝影記者圍了上來，將這一段情趣攝入鏡頭。<sup>38</sup>

1月18日的《中央日報》也記載，胡適在機場對前來送行的蔣經國說：「總統對我太好了，昨天我們談得很多，請你替我謝謝他」。<sup>39</sup>

從以上的幾則記載可以看出胡適與蔣氏父子的關係頗為密切。雙方對許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見（胡適主張「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即自由民主體制，蔣則希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即上文所提到基於民本的「一黨專政」，下文會進一步討論），但雙方確實是為了達成反攻大陸、維繫中華民國之目標，而做到「道不同而相為謀」。胡適也了解蔣經國多次代表蔣中正出面來接待他，而經國則以「父執輩」禮敬胡適。另一方面胡適也知道蔣經國掌握了情治機關的大權，且透過反共救國團企圖發展他在青年人之中的影響力。

胡適返美之後辭去一切職務，專心從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直到1954年2月18日至4月5日，他返臺出席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與副總統。開會之前蔣中正曾因「本人之性格與長處不應為總統，而願任副總統或行政院以施展我所長」，想要提名于右任、胡適為總統候選人。他在日記寫到「乃提黨內于右任，如提黨外候選人則仍推胡適，以上屆本約邀其為候選人而未能如約提出之故也」，不過臨時中央全會卻全體一致提名蔣為候選人。<sup>40</sup> 胡適在2月18日抵達臺

<sup>38</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6-8。

<sup>39</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2334。

<sup>40</sup> 《蔣中正日記》，1954年2月14-15日。此一推舉于右任與胡適為候選人的消息立即傳到國際媒體。如美國華盛頓的報紙有如下的報導“Nominating Group Rejects Chiang's Plea to Retire,” *Evening Star*, February 15, 1954, Page A-6.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北，蔣經國仍奉父命至機場接機。報紙報導：

胡氏座機……於九時四十五分鐘安降機場，胡氏首先下機，即與佇候梯前之蔣經國、葉公超、蔣夢麟以及數百歡迎人員握手，幾經四十分鐘之擁擠，胡氏始克走出機場，乘車離去。<sup>41</sup>

當天胡適對記者表示此次總統選舉是合法的，而且他擁護蔣中正與陳誠為正副總統候選人。<sup>42</sup> 此次返臺時胡適在日記之中僅留下了簡要的紀錄，記載開會經過（如3月20日選總統、3月23日選副總統）與親朋好友的聚會等。其中直接與蔣氏父子相關的是：2月19日，上午胡適擔任國大開幕典禮的臨時主席，「下午，曾謁蔣總統，晤敘近一小時」（見次日《中央日報》，蔣日記記載「晡約見胡適」）、2月21日下午蔣經國來訪、2月22日，陪同總統在松山機場閱兵。3月9日「中午十二時半，總統宴。（臺北賓館）」、3月21日「中午十二時半總統約見，並便餐」（總統邀約國大主席團，蔣日記記載「午宴胡適之、于斌等代表」）、3月25日「上午九時致送總統副總統當選證書」，<sup>43</sup> 「總統親自接受，並表示謝意」，「下午五時總統酒會」、3月26日「下午七時蔣經國先生請。（長安東路18號）……下午五時總統茶會。（光復廳）」、3月31日「下午七時總統請便餐。（士林官邸）」（蔣中正日記記載「晚約適之單獨聚餐，談話後晚課」）。4月5日，胡適記載「今天午後起飛。在臺北住了四十六天半。」<sup>44</sup> 當天蔣經國依往例「奉命送胡適行」，不過胡適的日記沒有記載。

胡適返程時在日本東京住了三個晚上，4月8日經夏威夷飛抵舊金山。4月9日《中央日報》的第一版，出現了一小塊報導：

---

Newspapers. Lib. of Congress, accessed November 14, 2022,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45462/1954-02-15/ed-1/seq-6/>.

<sup>41</sup> 〈胡適今返抵臺北〉，《大華晚報》，臺北，1954年2月18日，版1。

<sup>42</sup> 〈胡適今返抵臺北〉，《大華晚報》，臺北，1954年2月18日，版1。

<sup>43</sup> 胡適在1954年5月19日還與梅貽琦、李書華自美國聯合致電蔣中正，恭賀他就任第二任總統。〈胡適等三人致蔣中正電〉，收入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第4冊，頁163。

<sup>44</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81-99。

〔美聯社檀香山八日電〕胡適博士昨晚在此間聲稱，蔣總統的長子蔣經國是中國的麥加錫參議員，他們都在對共黨作戰，在這兩種事例而言，都只是方法的問題而已。胡氏說：蔣經國在臺灣也像麥加錫在美國一樣受人批評，但這種批評也像對於麥加錫的批評一樣，往往過甚其辭，在目前這個時候，負責保防的人自然會採取他們認為合理的方法。<sup>45</sup>

此則《中央日報》頭版上的報導頗堪玩味。編輯者可能想用胡適所說麥加錫（或譯麥卡錫）的比喻來說明蔣經國雖受到批評，不過此一批評與美國人批評麥卡錫類似，有一點「過甚其辭」，而蔣經國所採行的手法有其合理性。乍看之下，許多讀者可能不清楚為何胡適在檀香山要對記者說這樣的話。不過如果對照英文報紙，以及同一個消息來源的香港報紙，事情的脈絡就比較清楚。

首先，報紙上將蔣經國比喻為中國（或亞洲）的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1908-1957）這一次應該不是第一次。在胡適的檀香山講話之前，美國的報紙已有此一比喻。例如華盛頓*Evening Star*，1954年4月4日有一篇Earl H. Voss所寫的“Far East Leadership: Government by Committee Likely to Follow Chiang Kai-shek”（遠東領導人：委員會的政府可能會追隨蔣中正）提到蔣經國是中國的麥卡錫參議員：

The Defense Ministry office Ching-kuo heads is a combination un-Chinese Activities Committee and political commissar's training ground. That makes him a sort of Chinese Senator McCarthy, only with more power and fewer checks on it.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Ching-kuo doesn't use the blunt instruments McCarthy uses, however.

中譯：蔣經國所領導的國防部辦公室是一個「非中」活動調查委員會，加上政治委員培訓基地的組合。<sup>46</sup> 這使他成為一種中國的麥卡錫參議

<sup>45</sup> 〈胡適過檀島〉，《中央日報》，臺北，1954年4月9日，版1。《聯合報》的報導則是：美聯社檀香山八日電，〈胡適在檀島稱蔣經國是中國的麥加錫〉，臺北，1954年4月9日，版1。

<sup>46</sup> 此處將蔣經國的辦公室稱為「『非中』活動調查委員會」，意指類似美國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非美」（un-American）指違背美國理念，在麥卡錫時代即指共產黨。該委員會負責調查與共產主義活動有關的嫌疑個人、公共雇員和組織，調查不忠與顛覆行為。至於「政治委員」則是蘇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員，只是權力更大，受到的制約更少。不過，應該補充的是，經國並沒有使用麥卡錫使用的粗暴的手法。

He's more of a rapier man. Ching-kuo's newspapers recently attacked the eminent Dr. Hu Shih, educator,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for saying some government methods on Formosa were too close to the Communist way of doing things. Ching-kuo admits to using authoritarianism but says it is necessary until the nation's freedom has been regained, i.e. until the Communists have been driven from power on the mainland.

中譯：他更像是一個劍走偏鋒的人。蔣經國的報紙最近攻擊了知名的教育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胡適博士，因為他說臺島的一些政府方法太接近共產黨的做事方式。<sup>47</sup> 蔣經國承認使用專制主義，但他說，在國家恢復自由之前，也就是在大陸把共產黨趕下臺之前，專制主義是必要的。

The younger Chiang went to Russia when he was 16 "to learn more about revolutionary ideas," as he told his father at the time. He was a cadet in the Leningrad military academy, but in two years was kicked out for anti-Stalinist tendencies. After a seven-year stint in Soviet forced-labor camps, he came out a real anti-Communist, married to a Russian girl.

中譯：年輕的蔣經國在16歲時去了俄國，「想更多地瞭解革命思想」，正如他當時告訴他父親的那樣。他是列格勒軍事學院的學員，但兩年後就因反斯大林主義的傾向而被踢出。在蘇聯強迫勞動營待了七年之後，

---

聯式的制度。江勇振指出胡適從1940年代開始即常用「un-Chinese」說明佛教是「反中國的」。他認為胡適挪用麥卡錫慣用的「反美」一詞，顯示胡適「向極端右派靠攏」。江勇振又說「胡適在1950年代初期在美國幫蔣介石爭取美援的時候，就是用『un-Chinese』這個意思是『非我族類』的洋涇浜來形容中國共產黨」。見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542、591。江勇振，《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臺北：暖暖書屋，2022年），頁132。

<sup>47</sup> 有關蔣經國報紙對胡適的批評，後來胡適在美國與吳國楨見面時曾提到。1954年8月12日吳國楨寫給胡適的信提到：「你說你也知道蔣經國的報紙攻擊你。而且他也下了命令不准請你演講。比如說，『陸軍官校』（Military Academy）原先請你去演講，後來被迫無限延期。」參見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頁734。

他出來時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反共分子，與一個俄羅斯女孩結婚。<sup>48</sup>

我們不確定此文所用的「麥卡錫」比喻與胡適是否有關，不過此一說法與胡適所說的話是完全一致的。1954年4月8日西雅圖報紙*The Seattle Times*有一篇“Chiang’s Son Called ‘McCarthy’ of Nationalists”，此則新聞則和《中央日報》一樣來自「美聯社」從夏威夷發出的電訊：

前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昨晚說，蔣介石總統的長子是國民黨裡的參議員麥卡錫。「他們是同一型的。」這位著名的哲學家、現任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如此形容蔣經國少將：「他們同樣都是在與共產黨搏鬥。他們的問題，同樣都在於其所用的方法。」胡適說蔣的兒子「沒有憲法上所規定的職位」，不過他控制著軍隊裡的政治部門。<sup>49</sup>

此外，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還有一篇英文的報紙文章（附中文翻譯），William Miller, “Chiang’s Son Is ‘Asia’s McCarthy’”來自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的一家主流報紙*Cleveland Plain Dealer*（May 16, 1954），本文也註明根據「合眾社」，論點與上述的報導類似。文中提到：

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fessor, Dr. Hu shih, who recently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ttending the National Assembly here, drew a kinder picture. Chiang Ching-kuo, he said, is the “McCarthy of Asia”—in short, a man who feels that the results outweigh idle talk of “method.”

中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胡適博士最近甫由臺灣參加國民大會，返回美國，便給予一種較為溫和的描寫。他說，蔣經國是「亞洲的麥卡錫」——簡言之，他是一個認為結果重於「手段」的人。<sup>50</sup>

<sup>48</sup> Earl H. Voss, “Far East Leadership: Government by Committee Likely to Follow Chiang Kai-shek,” *Evening Star*, April 4, 1954, Page A-31.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 of Congress, accessed November 14, 2022,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45462/1954-04-04/ed-1/seq-31/>.

<sup>49</sup> 轉引自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頁739。

<sup>50</sup> 「Chiang’s Son Is ‘Asia’s McCarthy」（1954年5月16日），〈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06-005。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其次，香港報紙則將胡適談話的脈絡，以及胡適、吳國楨與蔣經國的差異說得更為清楚。1954年4月24-25日，香港的《星島日報》、《新生晚報》與《直報》，同樣依據「合眾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消息來源有更為詳細的報導。《星島日報》的標題是〈亞洲的麥加錫，胡適對蔣經國下評語，認他尚實踐不尚空言，是黑暗時代卓越人才〉、《新生晚報》的標題是〈臺灣問題人物，蔣經國其人 合眾社說：有人不喜歡他，他誠實，忠心耿耿，毫無問題〉，《直報》的標題是：〈合眾社記者筆下的臺灣大人物蔣經國：吳國楨說他是警察國家工程師，胡適說他是亞洲的麥卡賽，但他自有其擁護者與本領〉。<sup>51</sup> 這三篇報紙文章內容相近，而《直報》的內容較為詳細。從這幾篇報導可以更清楚了解胡適的「麥卡錫」比喻是為了回應吳國楨。吳國楨在1954年初在美國批評臺灣是一個「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而蔣經國是這個政策的重要推行者。胡適的比喻就是想要駁斥吳的說法，而為蔣經國辯護：

蔣經國個人的氣質是不大出風頭的，但最近為別人所推到頭條新聞的地位上去。對臺灣國民政府的批評者，前臺主席吳國楨，攻擊蔣經國為蘇聯教育出來的臺灣「警察國家」的工程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胡適博士，最近到此間參加國民大會後，回到美國去，也有他的看法。他說：經國是「亞洲的麥卡賽」，意見是：只計目的，不顧手段。<sup>52</sup>

在上述中，英文的報紙報導可以看到胡適的「麥卡錫比喻」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修辭策略，它可以清楚地讓美國與港臺讀者了解到蔣經國的作法與麥卡錫與美國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類似，一方面雖受到批評，另一方面亦有其合理性，甚至臺灣還有人支持他。這樣的陳述也駁斥了吳國楨的指控。

<sup>51</sup> 這三篇剪報收入國史館的「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參見「香港星島日報：亞洲的麥加錫」(1954年4月24日)、「香港新生晚報：臺灣問題人物蔣經國其人」(1954年4月25日)、「香港直報：合眾社記者筆下的臺灣大人物蔣經國」(1954年4月25日)，〈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06-004。

<sup>52</sup> 「香港直報：合眾社記者筆下的臺灣大人物蔣經國」(1954年4月25日)，〈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06-004。

胡適與吳國楨的交鋒在1954年4月（胡適返美之後）至8月之間更為明顯。有關此事原委可參看金恆煒、江勇振等人的研究。<sup>53</sup> 4月16日，胡適返美之後曾與吳國楨見面，兩人長談了八個小時。其後6月29日吳國楨在《展望》（*Look*）雜誌上刊出〈你們的錢在臺灣建立了警察國家〉（“Your Money Has Built a Police State in Formosa”），編者的案語是「蔣中正的前高階同事表示，委員長要讓出他的權力給兒子，其人要將臺灣轉變為共產黨式國家」。<sup>54</sup> 吳國楨從1954年初開始在美國對蔣氏父子的攻擊對臺灣有十分負面的影響，甚至可能影響到美援。例如民主黨的眾議員李察士（James P. Richards, 1894-1979，他擔任民主黨國會議員的時間為1933-1957）受到吳國楨影響，「決定調查受過蘇聯教育的蔣經國將軍，是否在臺灣實施秘密警察政制」。<sup>55</sup> 美國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因此而考慮是否應繼續軍援臺灣。蔣中正日記記載「參議院軍委會對我國軍政工制度認為將獲得其美援相反之結果，其惡意報告應加注意」，<sup>56</sup> 此一論調很可能是受吳國楨的影響。

8月16日，胡適在《新領袖》（*New Leader*）週刊刊出〈福爾摩沙有多自由？〉（“How Free Is Formosa?”），駁斥吳國楨，此文並由《時代》雜誌轉載（“Formosa: Rebuttal,” *Time*, August 16, 1954），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在此文中胡適一方面說吳國楨要為過去臺灣喪失自由的情況負責，另一方面則說「蔣中正統治下的福爾摩沙，自由空間已漸次擴大」。其中有關蔣經國接班問題，胡適用非常技巧的方式來說明，他說：

我認識蔣經國多年。他是一個苦幹的人，認真、有禮貌、愛國、狂熱反共。他的思想視野狹窄。這跟他在蘇聯多年有關。和他的父親一樣，他不貪污。因此難免自視為正義的化身。這點也跟他的父親很像。他真心地認為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一如他們對付敵人的殘酷方法。

<sup>53</sup> 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sup>54</sup> 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94。

<sup>55</sup> 報名不詳，根據內文應為眾議員。「香港剪報：美一參議員聲稱，要查蔣經國頭腦」（1954年月日不詳），〈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06-004。

<sup>56</sup> 《蔣中正日記》，1954年4月10日。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雖然我極不同意蔣經國對付共產黨以及有共產黨嫌疑的人的方法（我在1952年第一天抵達臺灣的時候就公開說過）<sup>57</sup>，我覺得會說出下述這段話的人精神有問題：「有誰能保證：在委員長死後，如果共產黨給予一個不錯的條件，他（蔣經國）會不會把臺灣成為共產中國富饒的一省？」無論如何，他不可能成為蔣總統的「繼承人與繼任」。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在政府裡沒有一席之地，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確切的職位是他父親最忠實的總管。在軍隊裡，他不受歡迎。從憲法或制度上來說，他根本就沒有成為他父親的繼承人與繼任的可能。<sup>58</sup>

胡適接著又為蔣經國的青年團是「倣法於希特勒青年團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事加以說明。胡適說臺灣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其實是一個公開的組織，「各校校長、教授和教員全部充任該團團長，而全體學生則加入為團員」，這樣的作法並非秘密的組織，也沒有秘密的訓練與教導，和希特勒及共產黨的作法並不相同。

胡適的這一篇文章在臺灣與香港各有一個中文翻譯的版本。臺灣的版本刊登於《中華日報》，題目是〈臺灣是如何的自由？〉（1954年8月21-22日）；香港的版本刊登於《工商日報》，題目是〈臺灣有什麼程度的自由？〉（1954年9月6-7日）。<sup>59</sup> 金恆煒注意到臺灣《中華日報》的版本「雖逐字譯出，但明顯的刻意刪掉胡適替蔣經國打包票的一段」。<sup>60</sup> 的確，比較兩個版本，香港的譯文是全文翻譯，臺灣的譯本則刪除了胡適在文章最後一部分所提出三個問題的解說，一、臺灣有沒有自由的選舉？二、蔣經國是否會成為蔣中正的繼承人？三、臺灣

<sup>57</sup> 胡適所說返國第一天「公開說過」應該是指1952年11月19日下午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根據《公論報》的報導，當時他僅談到要堅持民主與反共的陣營，反對極權統治，也反對第三勢力，似乎沒有提到蔣經國。參見，〈團結一切反共人士 應本寬大為懷態度 在兩大陣營下不會第三勢力存在 胡適昨在記者招待會稱〉，《公論報》，臺北，1952年11月20日，版1。

<sup>58</sup> 此一翻譯轉引自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頁737。

<sup>59</sup> 這兩篇剪報收入國史館的「蔣經國總統資料庫」。《中華日報》的文章見「中華日報：臺灣是如何的自由？（上）（下）」（1954年8月21-22日），〈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07-004。《工商日報》的文章見「香港工商日報：臺灣有什麼程度的自由？（上）（下）」（1954年9月6-7日），〈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07-005。

<sup>60</sup> 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108。

的青年團與希特勒、中共的青年團是否相同？這些內容因牽涉到蔣經國，尤其是胡適對他的批評，所謂「我極不同意蔣經國對付共產黨以及有共產黨嫌疑的人的方法」，因而遭到刪除。

無論如何，胡適的反駁使蔣中正安然度過吳國楨事件所造成的危機，而使臺灣繼續獲得美國的援助。蔣中正正在9月2日的日記指出：胡適不值得與吳國楨所捏造的事情辯論，他在《新領袖》的駁斥已經足夠了。蔣中正顯然對胡適在美國撰文協助感到欣慰。

胡適檔案之中再次提到蔣氏父子要到1957年底至1958年初，蔣中正任命胡適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之時。胡適先是以生病為由懇辭，後蔣仍希望他能接受此一職位。1957年12月6日胡適才回電表示同意，「請總統任命李濟先生暫代院長，負責處理院務，使適可以遵總統電囑，安心調養，早日回國就職」。<sup>61</sup> 12月12日蔣覆電，表示尊重胡的決定，「中央研究院院務，已照尊意派李所長濟暫代。仍希加意珍攝，早日康復，返國就任，至所企盼」。胡適後來告訴好友趙元任，他之所以願意接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是因為如果他不接，張其昀（1901-1985）或許會當院長，而中央研究院很可能會因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喪失學術自由。<sup>62</sup>

1958年4月8日，胡適自美返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下午2點50分飛抵臺北。蔣經國代表總統蔣中正至松山機場，向自美返國的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致問候。4月10日，他又以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出席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院士會議結束後，胡適與李濟兩人陪同總統、陳誠、蔣經國等參觀院中展出的我國古代的龜甲、銅器、陶器、石刻、簡，及「中國文字三千三百年（自殷商中葉至清代末葉）特展」，並留下幾張照片。<sup>63</sup>

在胡適回國前後，最為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一本批胡的書——《胡適與國運》的流傳。《胡適與國運》出版時撰文者用的是筆名，而且「並未載明出版時地及發行人」。該書內容是第一：不贊成胡適摧毀我國固有文化與倫理觀念，打

<sup>61</sup> 〈胡適致蔣中正電〉，收入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第4冊，頁393。

<sup>62</sup> 〈胡適致趙元任函〉，收入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第4冊，頁393。

<sup>63</sup> 「副總統陳誠參觀中央研究院文物展出」（1958年4月10日），〈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二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50101-00031-130。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倒孔家店，認為此乃「禍國殃民，毀文叛道」，對中華民國立國精神有所損害。「由於國民之道德趨落，五倫已亂，給共匪造成了很多機會，今日大陸之變色，與文化之沒落，不無關係」，換言之，五四反傳統思想種下中共興起的種子，並導致大陸的淪陷。第二，反對《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批判蔣中正總統。他們認為蔣中正是目前唯一能領導大家反共的領袖人物，「三十年來，誰比他為國出力更多？誰比他更愛中國？」當前局勢下，反攻是唯一的生路，《自由中國》不應鼓吹「反攻無望」。<sup>64</sup>

當時有一些人就從內容猜測此書的出版可能與蔣經國有關。例如在《自由中國》雜誌社工作的傅正（1927-1991）在日記中說：

今天的《中央》、《聯合》等報，都登載了一項中央社消息，說是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沈錡對外說，昨天各單位接到一本匿名攻擊胡適的小冊子，書名叫做《胡適與國運》，既無發行人，又無出版者，顯已違反《出版法》，下令嚴查云云。我的直覺告訴我，又是蔣經國的徒子徒孫耍的小把戲。果真如此，所謂嚴查云云，都必是些欺人之談了！……我又趕著把《胡適與國運》那本小冊子看完，覺得其中固也有若干道理，可惜謾罵多於討論，顯然另有企圖。<sup>65</sup>

後來查明該書的作者為臺大歷史系教授徐子明（1888-1973）與國防醫學院教授李煥燊（1903-1997）。他們因為與胡適意見不同，因而在他返國之際出書議論，並廣為流傳。不過當記者問到印刷經費的來源，李煥燊說，「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是我寫的，他們付印時是經過我的同意。至於在那兒印？花了多少錢？我完全不知道」。<sup>66</sup> 這確實是一個最啟人疑竇之處，誠如李濟所說：

最令人費解的，就是他們那兒有這麼一筆錢來印這份東西？我知道我們這群作教授的，每月充其量不過一千二三百元，家用尚感捉襟見肘，怎麼會有餘錢來作這件事？據傳來的消息，郵政局方面估計這本書寄出有

<sup>64</sup> 朱光漢（徐子明）、李博愛（李煥燊）等，《胡適與國運》（臺北：出版者不詳，1958年）。

<sup>65</sup> 傅正，《傅正日記》，第9冊（新北市：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9年），1958年4月5日，頁149。

<sup>66</sup> 〈李煥燊述撰文動機旨在反駁胡氏言論〉，《聯合報》，臺北，1958年4月7日，版3。

五千多本，這樣連書的成本帶郵費，這筆錢就得一萬多，足當一個教授七八個月的薪水，若只是為了學術上的意見不合，是不是值得這樣作？錢又從何處來？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sup>67</sup>

這個問題後來沒有人能解答，也沒有人知道書籍的出版與流通究竟與蔣經國或「太子派」是否有關。不過雷震倒發現，當《胡適與國運》續集出版之後，他聽說「政工幹部學校每人發一本」。<sup>68</sup> 胡適對此書的攻擊頗感無奈，他在1958年4月12日說「我一生被罵不少；我對這些罵我的話會生氣嗎？我一點也不生氣」。<sup>69</sup>

《胡適與國運》風波只是一時的事件，《自由中國》上的文章才是持續影響蔣胡關係的重要因素。蔣經國對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不滿從1950年代初期開始就一直存在，上文曾提到徐復觀批評救國團的文章。1955年7月27日，雷震在給胡適的信中又提到另一篇文章：「本期十二卷十期登載了李僉先生〈權威與權威統治〉一文，<sup>70</sup> 黨部大開會，經國大生氣，認為該文是影射蔣總統，因該文無誹謗，不能停刊，乃命《中國一周》為文駁斥」。<sup>71</sup> 同封信甚至批評經國之子蔣孝文利用特權錄取高中畢業獎學金。<sup>72</sup> 這種對蔣氏的批評至1956年10月《自由

<sup>67</sup> 〈《胡適與國運》風波乃學術界一不幸事 李濟認為胡氏將不介意〉，《聯合報》，臺北，1958年4月7日，版3。

<sup>68</sup> 見1958年6月14日的雷震日記。雷震，《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309。

<sup>69</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66。

<sup>70</sup> 李僉，〈權威與權威統治〉，《自由中國》，第12卷第10期（1955年5月），頁11-14。

<sup>71</sup> 《中國一周》由中國新聞出版公司出版。這是張其昀（1901-1985）於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時所創辦的一個雜誌。根據張其昀的日記，1950年4月8日，「六時在鐵路飯店舉行《中國一周》第一次編輯會議，予擬定發刊例言，並聘定編輯十五人，趙友培君為專任編輯」。張其昀，《質樸堅毅：張其昀日記（1949-1950，1952）》（臺北：開源書局、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頁61。雷震所說的駁斥文章可能是〈社論：五年來的自由中國〉，《中國一周》，第256期（1955年5月），頁2-3。以及在同一期歌頌蔣總統的幾篇文章，如邱昌渭，〈中華民族的信心和力量〉、成惕軒，〈實踐總統的訓示—新〉、黃雪邨，〈一身繫天下安危〉等「慶祝蔣總統就職週年」紀念專輯的文章中主張「擁護總統」的文章，刊《中國一周》，第256期，頁5-8。

<sup>72</sup> 〈雷震致胡適函〉（1955年7月27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頁75-76。

中國》的「祝壽專號」而達於高峰，此刊多次再版，傳播甚廣。胡適在此刊所寫的〈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所提出的「三無」，「無智、無能、無為」，又激起海外雜誌的迴響。當時在僑務委員會任職的李樸生（1896-1986）以筆名唐筠卿在1956年12月15日香港《自由人》發表〈能「三不」而後能「三無」〉，呼應胡適的觀點。所謂的「三不」是「不在主管負責人充分發表意見之前，先表示意見」、「不對於和自己不同的意見，馬上發脾氣指責。更不利用特務，硬對不同意見的人，亂加罪名，擅加禁錮」、「不用特務的人，在各機關裡起控制作用」。<sup>73</sup>文中對「特務治國」的現象大加批評，而箭頭所指自然是蔣經國。他甚至在信中對好友陳克文（1898-1986）說：

這幾年來，我真覺得特務工作對防奸防諜之功，遠不如其濫用威權，荼毒人民，影響政府，趕走人心之罪大。蔣先生重特務而輕人心，以為憑特務可以反攻復國，真是千慮之一失！……經國先生聰明、能幹、刻苦、耐勞，有蓬勃的朝氣，有萬鈞的肩膀，是大家都知道的。這樣一個有為的人才，蔣先生應該讓他去擔任正大光明，接近民眾的職務，俾能對國家有卓越的貢獻。但同時經國先生又要擔任特務頭子，做地下活動，見不得光的事情。蔣先生也許以為別人做特務，會有許多顧忌，會有許多隱諱，做得不夠公道，而希望他能排除一切顧忌，做一個現代的包青天！這用心之苦，我們是欽佩的。但特務網之分布，一定三教、九流、四海、五岳的人物都有。「嗚呼！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因此，外國朋友把經國先生看成什麼樣子的人？若干抱道自愛的賢達，把經國先生看成什麼樣子的人？若干純潔優秀的青年，把經國先生看成什麼樣子的人？蔣先生似乎應該考慮一下的。<sup>74</sup>

<sup>73</sup> 唐筠卿，〈能「三不」而後能「三無」〉，《自由人（香港）》，第604期（1956年12月15日），版1、3。

<sup>74</sup> 〈李樸生致陳克文函〉（1956年12月3日），未刊史料，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先生提供。

在寫完這一封信後幾天，他就寫了「三不」一文並寄給陳克文於《自由人》上發表。12月19日雷震在日記中提到他聽說這一篇文章受到批評，「國民黨認為詆毀總裁，已予扣留，不准發行」。<sup>75</sup>

上述的文章都可以看出以胡適、雷震為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與蔣氏父子之間的衝突，此一衝突的核心是蔣氏父子的蘇聯式「一黨專政」、「特務政治」與胡適所堅持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間的矛盾。從吳國楨案顯示，胡適在面對此一衝突時願意做某種程度的妥協，他希望能維繫蔣氏統治，再逐漸改善其不合理之處。然而受到胡適影響的殷海光（以及後來的雷震）等人卻不願做出妥協。

殷海光打著胡適的旗號對一黨專政做出嚴厲的批評。他的批評加深了雙方的緊張與蔣經國的反擊。1958年12月15日殷海光在臺灣大學給了一個名為「胡適與國運」的演講。此一演講顯然是針對幾個月前的《胡適與國運》一書。這一個演講甚為轟動，根據殷海光記載：

那一天下午七點鐘，我在校本部開講，由於題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吸引力，當時連走廊上和窗戶上都爬滿了青年。……在這篇演講中，我提到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最有影響的人物時，只列舉了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之四位先生，而沒有列舉別的人物。<sup>76</sup>

演講的內容後來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9期之上。殷海光的演講從近代思想史上兩派的鬥爭講起，進而提到胡適思想受到左右的夾擊。他提出一個很尖銳的問題，為何左邊的赤色政權與右邊的反赤政權都對胡適不滿？他認為這是因為左右邊都主張「一黨專政」，而與胡適的思想有矛盾。他表示今天臺灣的生存必須要靠「反共」，而反共的有效方法則是放棄「一黨專政」，走自由民主的道路。殷海光說「一黨專政」是一條「死胡同」：

說來真是一個悲劇，目前反赤者之反赤，係從與他們所反的對象同一立

<sup>75</sup> 見1956年12月19日的雷震日記。雷震，《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8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350。

<sup>76</sup> 殷海光，〈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收入殷海光，《殷海光全集第10冊：政治與社會（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1157。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足點出發的。他們動輒「以主義對主義」，「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黨對黨」，……身居臺灣的一般人，被泡在這種氣氛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可是，面對此情此境，又怎能禁止西方一般稍具觀察力的人說二者「隔海同唱」！這樣反赤，只有把問題愈弄愈糟，糾結愈弄愈亂。我們要反赤成功，必須從這條死胡同裡退出來。<sup>77</sup>

在文章最後，殷海光問「中國何處去呢？」，他的答案是胡適所提出的「民主」：

幸好，西方人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這個啟示就是五四時代胡適等人所提出的「民主」。我們積歷史中長久經驗的觀察，深知要打開中國治亂循環的死結，最見效的方式，有而且只有實行民主。有而且只有實行民主，中國才能希望結束目前的禍亂，而步入一個新的里程。目前臺灣所行的一黨專政，在政治的實質上，實在是專制政體和貴族統治底一種變形。所以，如果我們希望中國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那末先決條件就是結束一黨專政。現在以霸力行一黨專政者似乎是因反共抗俄之需要而「義不容辭」的樣子。然而，作者窮思力之所及，除了發現骨子中係為著少數人底面子和一個團體底現實利益以外，找不出任何一條理由來為一黨專政應該永遠繼續下去作辯護。誠如胡適所說，中國底問題很不簡單，並不能因組織反對黨而解決。但是，一黨專政確是卡死滿盤棋子的絕著。走活這一著棋，則新生之機立見。所以，結束一黨專政，至少是中國國運轉機底必要條件。<sup>78</sup>

從演講內容可見殷海光的立場十分鮮明，而文中所謂「以霸力行一黨專政者」顯然就是蔣氏父子。

蔣經國在演講之後立即注意到殷海光等人企圖要打倒「我們的政府」。<sup>79</sup> 他

<sup>77</sup> 殷海光，〈胡適與國運〉，《自由中國》，第20卷第9期（1959年5月），頁282。

<sup>78</sup> 殷海光，〈胡適與國運〉，《自由中國》，第20卷第9期（1959年5月），頁283。

<sup>79</sup> 蔣經國早已注意到殷海光，1957年5月他曾邀請「大學中若干對政府時加攻擊之教授在家餐聚」，「其中有殷海光者，年紀最輕，但是把自己裝成老資格，陰陽怪氣拒人於千里之外，初次相會，一見即知此為傲橫之徒。常讀殷某反政府之文字，並不知此為何許人，今日見其真面目，乃證明『惡言出於惡人之口』是正確的說法」。在1958年12月26日的日記中，他說「殷海光在臺灣大學對學生公開發表反動言論，此實為從來所未有者，應加以注意也」。有關蔣經國將殷海光「視若寇讎」，參見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183-184。

在12月25日對情治單位「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工作同仁」的訓示中提到要把「殷海光這種反動的思想打下去」：

我前兩天看到一件情報，殷海光在臺大對三百多個臺大學生講話，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說我們的政權是一個獨裁的政權，我們沒有人權保障，他很明顯的提出來要打倒我們的政府，並且說最近這幾十年以來在思想上學術上影響最大的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胡適之，對思想學術有研究的人聽到他這種說法，當然感覺是一種很怪的想法。他對政府的攻擊有他的一套技巧，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來追究這個問題，上次我在安全局也講過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不是光靠權力來解決問題的時候，因為要注意到輿論、民心、社會的安定，並且用權力來解決問題也不能夠通通的解決問題，那麼我們就要來研究這種政治作戰的技巧，用什麼方法把殷海光這種反動的思想打下去。我們再回過頭來想想，雷震他們幾個人，憑什麼一種力量能這樣囂張呢？當然，整個的環境也有點關係，但是我們想想，拿我們的人才來講，拿整個調查局的人才來講，對付一個《自由中國》，對付一個雷震都對不過他的話，那我們怎麼能夠反攻呢？我們現在無論在理論一方面，在學術一方面，我們調查局都可以拿出人來，方法上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就是我覺得調查局要積極替黨做工作，一定是要從消極的情報工作而轉向到積極的政治作戰，拋開其他一切政治上不必要的活動，這個才是我們調查局今天的一條大路，這樣慢慢可以形成一個反共的、鬥爭的、智慧的思想領導根本的依據。<sup>80</sup>

蔣經國很清楚地了解殷海光背後是胡適與雷震，他堅信如果不打倒這些人，「那我們怎麼能夠反攻呢？」

胡適也很清楚地認識蔣經國與他們之間有深刻的矛盾。他採取的作法是聯合陳誠，並對蔣經國加以勸誡。他在1958年5月26日，在陳誠的官邸曾當著陳誠、陳雪屏與蔣經國的面提出蔣經國不宜負責情治工作，以免造成國外對他的負面觀感、蔣總統不宜三連任、國民黨應「毀黨救國」，以及「出版法」的問題等。對此批評蔣經國「未發一言」。幾天之後蔣經國就將胡適的意見告訴蔣中正。蔣中

<sup>80</sup> 「蔣經國對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工作同仁訓示演講稿」（1958年12月25日），〈蔣經國演講稿（三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31-013。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正對胡適勾結美國、想要組反對黨等事十分不滿，認為胡適對「我黨之仇恨，甚於共匪之對我也」。胡適與蔣氏父子之矛盾，從「商山四皓」（1959年1月胡適、蔣孟麟、梅貽琦、王世杰與陳誠南下旅遊）、「三連任」到「雷震事件」延續不斷。1959年香港《聯合評論》的一篇文章寫到胡適返國之後因為上述這些事件使他「在蔣總統尤其是太子派的心目中已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

胡適之自從在中央研究院就職典禮中對蔣總統失敬以後，他在蔣總統尤其是太子派的心目中已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去冬蔣總統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宣佈反對修改憲法時，他又不能善體上意，公然在大庭廣眾中高舉雙手表示贊成。今春又和陳誠有台南之游，太子派更視為眼中釘。最近他由美國回台，不但不說華僑和美國人都一致擁護蔣總統永秉國鈞，反而表示彼邦人士並不贊成他再連任，誠不愧政府之誣友也。<sup>81</sup>

1959至1960年之間蔣經國與胡適的關係，筆者在《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的第七章有詳細之描述，茲不贅論。<sup>82</sup>

從胡適方面的史料來看，胡適返國前後的幾年之間與蔣經國的關係主要環繞著三件彼此相關的事情，第一、因為《自由中國》聯合海外第三勢力對蔣氏父子的「一黨專政」、「專制獨裁」、「特務政治」、「政工制度」與「家天下」的批判，引起蔣經國對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的不滿。第二，誠如美國人的分析，臺灣有三股勢力，一為陳誠勢力，二為蔣經國勢力，三為胡適《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勢力。<sup>83</sup> 胡適在三股勢力競合的過程之中明顯地傾向與陳誠合作。蔣經國也發現陳誠與胡適為首的北大知識分子有聯合的趨勢，因而有所警惕。第三，蔣經國對胡適反對蔣中正「三連任」、支持組黨與反對雷震案的態度等有所不滿。因為上述三方面的衝突，胡適了解蔣氏父子（乃至陳誠等國民黨人）在政治理念上都支持黨國體制、反對自由民主，然而為了顧全大局，他儘可能與蔣氏父子維持表面上的和諧，胡適不但在吳國楨事件時支持蔣氏父子，在三連任、雷震案的尖銳衝突下仍然不願撕破臉，表現出對蔣氏政權「道義上的支持」。至於蔣

<sup>81</sup> 公亮，〈胡適之再談連任〉，《聯合評論（香港）》，第62號（1959年10月23日），版4。

<sup>82</sup> 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頁289-390。

<sup>83</sup> 徐永昌1959年3月26日日記；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2冊，頁460。

經國，他也了解胡適等人的立場與他們不同，不過在表面上他也不願與胡適發生直接的衝突，仍希望維持和諧的關係。

1962年2月6日大年初二，「蔣經國來拜年，並代總統邀請先生夫婦於八日中午到士林官邸吃飯」。2月8日「十二時，先生偕夫人同到士林去應總統的午飯。飯後，蔣夫人送胡夫人一些年糕鹹肉，也帶回來了。」<sup>84</sup> 這是蔣氏父子與胡適最後一次見面。2月24日，胡適在中研院院士會議的酒會中因心臟病發而過世。2月26日，蔣經國前來弔唁，胡頌平有詳細的記載：

八點零五分，最早來弔唁的蔣經國，先向靈堂行禮後，就到靈帷的後面，瞻仰先生遺容。對記者說：「國家正需要他的時候，他卻溘然與世長辭，真是國家民族的一大損失。前天在南部聽到胡先生的噩耗，內心裡好像突然受到了重擊，使他無限難受」。他又到了福州街慰唁胡夫人說：「胡先生這樣去世，就如一個大將死於沙場一樣，不僅光榮而且偉大，永垂不朽」。<sup>85</sup>

以上是胡適相關史料之中有關蔣經國的記載。那麼蔣經國對胡適的態度究竟如何？最近公布的《蔣經國日記》提供了一些線索。

### 叁、蔣經國日記中的胡適

有關蔣中正與胡適的關係，以及蔣日記中對胡適的批評，已有學者做過分析。簡單地說，1949年之後胡適回臺灣訪問時，蔣常常邀請他參加各種活動，並給予經費資助，蔣也在1957年底請他返國擔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胡適對蔣也十分支持，二人關係看起來非常融洽。可是蔣在日記裡，則表現了對胡的深度嫌惡與痛恨。<sup>86</sup> 由此可見，對蔣中正來說，日記不但紀錄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同時

<sup>84</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頁3878、3879-3880。

<sup>85</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頁3915。

<sup>86</sup> 參見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著，《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也作為一種情緒抒發的工具與管道，把在公開場合中無法說的以及不能做的，透過日記書寫來進行宣洩。其中1958年6月3日，也是蔣中正正在聽到蔣經國向他報告胡適在陳誠官邸提出「毀黨救國」後的幾天，他寫到：

胡適態度最近更為猖狂無法理喻，只有不加理會但亦不必與之作對，因為小人自有小人對頭也。對於其所言反對修憲與連任總統之謠誣，乃是一般投機政客有意污蔑之毀蔣運動，不僅余本人即本黨亦從未有此意向，希其審慎勿受愚弄。至於毀黨救國之說不勝駭異，中華民國本由國民黨創造，今遷臺灣全名實由國民黨負責保全，如果毀了國民黨只有拯救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偽國，如何還能拯救中華民國乎，何況國民黨人以黨為其第一生命，而且視黨為其國家民族以及祖宗歷史所寄託者，如要我毀黨亦即要我毀滅我自己祖宗與民族國家無異，如他認其自己為人而當我亦是一個人，那不應出此謬論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應由辭修或岳軍轉告，與其切誠。<sup>87</sup>

上面的話可以看出蔣中正的黨國觀念與胡適自由民主思想的尖銳矛盾。不過，為了顧全大局，他表示對胡適「不加理會」。<sup>88</sup> 那麼，蔣經國怎麼看胡適呢？

從1949年之後的蔣經國日記來看，其中提到胡適的部分共有93天（日記與反省錄部分，合計一天）。其中1952-53年胡適返臺之間共16則；1954年胡適返臺參加國民大會時共11則；1955-57年之間共13則；1958年18則、1959年15則、1960年9則；1962年胡適過世前後共7則，1963-1975年間有4則。<sup>89</sup> 在閱讀這些日記的內容之前，首先要了解蔣經國撰寫日記時，他所想像的讀者主要是他的父親

---

出版公司，1991年），頁97-112。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紀錄〉，《近代史研究（北京）》，第182期（2011年3月），頁18-33。

<sup>87</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6月3日。

<sup>88</sup> 有關1949-1962間蔣中正與胡適的關係，亦請見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

<sup>89</sup> 《蔣經國日記》現藏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2020年初開放查閱，共計18盒。相關資訊如下：Title: *Chiang Ching-kuo Diaries*. Date: 1937-1979. Collection Number: 2007C1. Contributing Institution: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以下的註解稱之為《蔣經國日記》）

蔣中正，因為他必須定期將日記交給父親批閱。<sup>90</sup> 同時，蔣經國的日記和蔣中正的日記一樣，也是作為情緒宣洩的一個管道，因此也出現「表裡不一」的現象。

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胡適應臺大、師大之邀返臺講學。在這段期間蔣經國有7則紀錄。1月17日他去機場接胡適，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對胡適的負面觀感：「八時半到機場接胡適之，明知胡在此時所能帶給我們的除禍患以外，別無其他矣，因他的思想足以動搖一般人的鬥志。」<sup>91</sup> 他察覺到一般人的看法與他不同，報紙上對胡適大為讚揚，視之為「英雄」，而且胡適在各地的演講都受到人們高度歡迎。<sup>92</sup> 蔣經國認為這是中央宣傳工作上的失敗，負責人員缺乏「黨性」：「胡適之來臺灣，臺方所有報章皆大捧之，此即證明我中央宣傳政策之失敗，一般負責人員毫無黨性，此為心理上之最大危機」。<sup>93</sup> 他說：

胡適之實在是亡國的罪人，是國家的敗類，而臺灣群眾反視之為「英雄」，群眾之盲從心理如不加管制，則實在可怕極了，現在有志氣的人多不出頭講話，而到處喊叫的則多是政客流氓之流，如何使好人抬頭？<sup>94</sup>

他又寫到：

胡適來臺灣一定會帶來災禍，在其到臺北時我就有此看法，而今果不出余之所料，胡適本來就是政客學閥，他反動的危害政府的言論，本不足奇，而使人寒心的是黨部、黨報、黨員為黨的敵人而捧場，可知我黨黨性之弱矣，問題不在於胡適這一類人，而是在於如何健全本身，否則辛辛苦苦用三年心血所造成的基礎，將全部崩潰，此為目前之重大危機。<sup>95</sup>

<sup>90</sup> 此一因素是否會影響蔣經國日記的可信度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我認為比較可能影響的是一些私密性而不願父親知道的地方，其他部分可信度較高。例如黃清龍提到「在1954年【10月30日】的日記上，有了驚人的發現：日記中蔣經國直接否認章亞若所生雙胞胎與他有關，還明確指出雙胞胎的生父是他的老朋友王繼春」。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4、230-231。這一段可能是蔣經國故意寫給父親看的，「藉此『鞏固』其培養接班不受動搖」（黃清龍上引書，頁243）。

<sup>91</sup> 《蔣經國日記》，1952年11月19日。

<sup>92</sup> 雷震寫到：「散會時女學生人山人海包圍要求胡先生簽名」（1952年11月26日）。雷震，《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頁163。

<sup>93</sup> 《蔣經國日記》，1952年11月22日。

<sup>94</sup> 《蔣經國日記》，1952年12月6日。

<sup>95</sup> 《蔣經國日記》，1952年11月29日。

此一感想可能是因為蔣經國讀到胡適11月28日在《自由中國》社參加創刊三週年紀念會所做的演講。胡適在會中演講40分鐘，內容刊登在《公論報》、《自由中國》之上，他強調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言論多了，可以使當局養成接受批評和容忍批評的習慣」。他又說我們不應該「看共產黨有什麼方式，認為應該學共產黨的方式來對付共產黨」；「我們應了解：我們的希望，是在民主自由這一方面。我們當政的人，應該極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評。什麼是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評呢？輿論就是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評。輿論的批評，只要是善意的，就應該承認是合法的。」<sup>96</sup> 蔣經國認為這些看法會為臺灣「帶來災禍」。

在胡適訪臺期間，蔣經國有時必須參加歡迎聚會，他內心不願意與這一個「學閥政客」打交道，但又為了「國家」，不得不「以禮待之」。例如：「到錢思亮家中訪胡適之，此為一學閥政客，而今天不得不以禮待之，自有苦心之所在，一切為國家耳」；「中午赴錢思亮宴，席間有胡適之」；「七時參加父親請胡適之宴會」。<sup>97</sup>

蔣經國對胡適言行之應對方式有二。首先，他與父親商談此事，表達對胡適的不滿。例如1952年12月17日，這一天是胡適62歲生日。蔣經國因父親忙於招待美國參議員希肯魯伯（Bourke Blakemore Hickenlooper, 1896-1971），感到父親為國操勞，然而大家卻不知道他的辛苦。他又談到：「上午陪父親在陽台上閒談約一小時，其中曾以胡適無禮之舉報告，引起父之氣憤，事後思之甚悔」。在蔣中正日記也僅簡單記載「經兒來陪，談胡適事」。<sup>98</sup> 我們不確定此處所說的「無禮之舉」究竟是哪一件事。如果對照當時的蔣中正的日記來看，可能是12月11日晚上在日月潭，蔣胡見面，胡適放言直諫，刺激了蔣中正，使他「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時服藥後亦不奏效，苦痛極矣」。<sup>99</sup>

其次，蔣經國在情報機關開會時，向情治人員提出警惕：「八時半召集各情報機關負責人員於總政治部，檢討臺灣的保防工作，並由余說明目前之環境，針

<sup>96</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2236。

<sup>97</sup> 《蔣經國日記》，1952年12月17日、1952年11月23日、1953年1月4日、1953年1月10日。

<sup>98</sup> 《蔣中正日記》，1952年12月17日。

<sup>99</sup> 《蔣中正日記》，1952年12月12日。

對胡適之之反政府言行，提出警惕」。<sup>100</sup> 其實蔣經國不只是警惕，還有具體的行動，即在他所主導的報紙上刊登批判胡適的文章。

不過蔣經國在表面上還是維持與胡適的良好關係，這也是他的父親給他的忠告。1月中旬，胡適即將回美國，蔣中正指示經國：「父親又囑在胡適離台之前，應再去看他一次，此乃為父親之苦心，亦為使兒在奮鬥中少樹敵人也，聽諭之後，感動甚深。」經國乃「訪胡適之談半小時」。<sup>101</sup>

1953年1月17日，胡適返美，經國奉父親指示，前往送行。報紙記載經國對胡適執禮甚恭，當天早上還送了一尾魚給胡適佐餐。當晚蔣經國的日記記載，「午後奉諭送胡適之返美，此次我得罪了胡適之，但是保全了軍中思想的統一性」。他又說：「有人勸余不必由政治部機關報，以免得罪胡適，作如此看者，政客也，我黨同志不知策略與政策本質之不同也，此次得罪了胡適，但為本黨之立場爭得了勝利，至少軍隊思想未受胡適之影響也」。<sup>102</sup>

此處所謂的「得罪」並不是兩人當面起衝突，而是蔣經國指示在總政治部所辦的報刊《戰士日報》（即1952年10月10日創刊的《青年戰士報》）上撰文批評胡適的「個人自由主義」，因而「保全了軍中思想的統一性」。<sup>103</sup> 胡適返美之後曾告訴蔣廷黻，此次訪臺，他與蔣氏父子交手的經過。1953年1月28日，蔣廷黻在日記中寫到：

---

<sup>100</sup> 《蔣經國日記》，1952年11月28日。

<sup>101</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1月16日。

<sup>102</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1月19日。

<sup>103</sup> 《青年戰士報》為國防部總政治部創辦的小型報，1952年10月10日創刊。此報主要的讀者是軍人。目前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從1953年1月開始。該報所刊登駁斥胡適思想的文章如〈社論：駁個人自由主義〉，《青年戰士報》，臺北，1953年1月9日，版1。自強，〈一個基本的思想問題〉，《青年戰士報》，臺北，1953年1月19日，版4。此文直接點名胡適，並批判他在三軍球場演講時所提出的兩點：第一，我們國家的命運是繫在自由世界的命運之上。第二，個人自由非常重要。作者認為胡適的觀點是「崇尚西化，捨己從人」，作者強調國家的重要性，「要自立始可以獨立」，「要自強始可以自由」。此外1月26與29日都各有一篇討論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文章，作者都強調國家自由的重要性。一是但昭文〈略論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1月26日）；一是胡逸民，〈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1月29日）。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跟胡適在他的公寓裡談了一個半小時。蔣經國屬下的刊物在他一到，就有批判他的文字。他跟蔣的談話不愉快。他極力勸蔣終止一黨專政，擴大司法的權力以保障言論自由。但蔣聽不進去。他也批評宣傳部門效忠領袖的作法。<sup>104</sup>

蔣經國在報紙上批判胡適的作法，在黨內也受到一些抵制。蔣經國發現：「聞中央黨部圖書室不肯把《戰士日報》供人公開閱覽，因為此報批評自由主義甚烈之故也，黨部方面如此作法，何不令人為黨之前途憂也」。<sup>105</sup>

1953年1月底胡適返回美國之後，蔣經國日記有4則與胡適相關。前兩則是蔣經國聽說胡適在美國批評他。首先他聽到胡適說蔣中正的失敗一定敗於蔣經國之手：

聞胡適在美國說「將來蔣總統失敗，一定敗於蔣經國之手」，此種惡意之宣傳出於胡適之口，不足為奇，因為胡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既是違反民族利益，而又想做大官，所以同我們自然會是處於敵對的地位，但此種說法，一方面固然是惡毒，同時亦是非常值得自己警惕的。余一定要做到如何不使敵人笑，而一定要使敵人失望。<sup>106</sup>

另一則是聽到胡適說「蔣經國的作法是共產黨的作法」，對此他只有置之不理：

葉公超自美國回來時對余說「有許多美國人懷疑你是在為共產黨工作」，上月有一外國傳教士在火車上問一青年「蔣經國是不是共產黨？」胡適亦說「蔣經國的作法是共產黨的作法」，從這許多事實看起來，一定有人在背後作有計劃的破壞工作，對於如此惡毒之宣傳，置之不理為上策，但亦可知敵人用心之苦矣。<sup>107</sup>

<sup>104</sup> 轉引自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頁734。

<sup>105</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1月19日。

<sup>106</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4月4日。

<sup>107</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4月30日。1955年沈昌煥從美國回來，也告訴他一些類似的批評：「〔沈〕昌煥自美歸來，談及美國方面各界人士對余之看法與說法，確有許多地方值得反省之處，如霍華德所說：『我喜歡蔣經國，但是不喜歡他的政工，他有俄國思想。』胡適說：『今天的臺灣報紙都是蔣經國所控制的，毫無言論自由可言，蔣經國一定會設法致孫立人於

1953年的另外兩則是蔣經國訪美時拜訪胡適的紀錄，這兩則報導在胡適檔案之中完全沒有記載。有關1953年9月至10月的蔣經國的美國之行，林孝庭在前引書中「初次訪美的學習之旅」一節有詳細的描寫。蔣中正希望他多觀摩學習美國的作法，又要他代為訪問舊友。美國人則希望藉此改變蔣經國的思想傾向，「對小蔣的左傾信仰是否能帶來一些『正面』的變化」。例如，他在拜會國務卿杜勒斯時：

杜氏在談話結束前突然提及，他從美駐台人員得知蔣在處理情報與安全議題時，手段「有一點粗暴」（a little rough），擔任英文傳譯的隨行秘書沈錡一時愣住，未立即譯成中文，現場出現一陣不安的沉默，杜勒斯見狀又再重複提一次，並希望小蔣此行能參考美國的情況，理解到並非需要訴諸粗暴與違反人權的手段，才能處理內部顛覆等安全議題；此時沈錡把這段話如實譯出，蔣聞後低聲喃喃自語一番，表示知道了。<sup>108</sup>

杜勒斯的「教訓」使蔣經國自我反省，而更為認清民主的意涵。不過此一轉變顯然是逐步的。在訪美期間蔣經國曾兩度拜訪胡適，從日記的記載可以看出兩人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第一次是9月30日在華盛頓，胡適專程自紐約前往，參加在「雙橡園」舉行的歡迎會。蔣經國記載：

十一時到華盛頓，即至我國大使館，由顧大使介紹與各方面人士見面並聚餐，美方國務院國防部皆派代表來接。<sup>109</sup> 下午二時二十五分在白宮訪見艾森豪總統，談二十分鐘，多為交際應酬之語，余以艾所著《歐洲十字軍》中譯本贈之。三時訪胡適，再訪伯羽、國華、復恩諸友，與俞大維晚餐，參加顧大使之宴會，到美政府高級人員甚多，余在席間發表演說。<sup>110</sup>

---

死。」柯克講：『我真不懂為什麼中國軍隊這樣怕蔣經國？』而在華僑方面，則以為總統有私心，想把政權交給他的兒子蔣經國，這許多說法主要的意思是說蔣經國在政府做事，對於國家是不利的，這自然是共匪有計劃宣傳的效果」。《蔣經國日記》，1955年10月31日。

<sup>108</sup>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頁207。

<sup>109</sup>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當天顧大使的餐會參加者包括「大使館官員，僑團代表和華僑社會人物亦被邀作陪。胡適、俞大維、郭秉文、嚴家淦、查良鑑、雲竹亭、謝仁釗和曾虛白等亦參加」。「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九日專電蔣經國經舊金山向東橫越美國訪問抵達雙橡園時大批中國大使館官員和僑團代表在場歡迎」（文件未載明時間），〈蔣經國訪美期間電文暨報導及陳誠訪美會談資料〉，《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5-00016-014。

<sup>110</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9月30日。《歐洲十字軍》（*Crusade in Europe*）是艾森豪的回憶

第二次是在紐約，蔣經國到胡適家中拜訪：「上午訪胡適於其寓所，談約兩小時，大家都很客氣，其實我並不想說服他，而他亦無法說服我，我惡他沒有國家觀念，而又是一心想做官」。<sup>111</sup> 可見蔣經國對胡適的惡感仍然存在，雙方的談話並無交集。

1954年蔣經國日記中有11則紀錄，前半部分與胡適返國參加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有關，後半年則涉及吳國楨案。有關國大的部分主要是與胡適見面的幾個場合，內容都很簡短，例如2月18日「九時半到機場接胡適」；2月21日「下午訪胡適」；3月26日「晚宴胡適、于斌等」；4月5日「中午奉命送胡適行」。其中少數對胡適加以稱讚的是2月19日的國大開幕致詞，他說「國民大會於十時正開幕，由胡適任臨時主席，致開幕詞，頗得體」。這是因為胡適在會中支持蔣中正繼任總統。此一階段蔣經國較為不滿的是對出任副總統候選人的陳誠，例如：

薛岳為陳誠到處活動，選舉副總統，此即為軍閥官僚與政客之混合體。聞陳誠反對反共義士向國民大會致賀，凡是我所要做的事，陳誠沒有不反對的，真不知陳誠在打算些什麼，太使人看不起了。

自陳誠當選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後，為黨國之前途憂甚，此人有兩副面孔，言行不一，以擁護總統為名，而謀權位為實，今又聞他當選副總統之後，並想兼行政院長，如此更可暴露其政治之野心矣，為了保障革命，不能不有所防備也。<sup>112</sup>

再者，陳誠為了想爭取胡適的合作而展開的溝通、解釋的活動，蔣經國對此不感興趣，但又不得不參加：「陳誠所召開的『向胡適作政治解釋座談會』，本不想參加，後來為求『合作』見，還是決定去參加。」<sup>113</sup>

有關吳國楨案的部分上文曾談到胡適在美國撰文批判吳國楨的觀點，並以「亞洲的麥卡錫」為蔣經國的所作所為加以辯護。對此蔣經國並不表示感激，反

---

錄，由世界書局譯印，1953年出版。

<sup>111</sup> 《蔣經國日記》，1953年10月9日。

<sup>112</sup> 《蔣經國日記》，1954年2月15日、1954年2月18日。

<sup>113</sup> 《蔣經國日記》，1954年3月30日。

而針對胡適在文中批判他的言論而耿耿於懷：「最近胡適之發表了一篇文章駁斥吳國楨，而其內容中則有『我極反對蔣經國的殘暴』的意思，總之在今天我是眾矢之的，必須小心謹慎堅定奮鬥，才能渡過難關。」<sup>114</sup> 他覺得吳國楨、李宗仁與胡適都一樣，攻擊蔣經國是為了攻擊蔣中正，而蔣經國的責任是完成「父親之大業」，他也擔心父親會因為自己的過錯而受辱：

政敵們所加於我的謾謗與攻擊，日甚一日，政治空氣之惡劣，為從來所未有。敵人們由所謂圍剿蔣經國的策略，轉變到陳雪屏所倡導的所謂捧老子打兒子，以及擁護蔣總統拆散國民黨的鬥爭路線，如此惡毒的方法，說明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理。吳國楨、李宗仁與胡適皆以余作為攻擊之對象，而事實上則在攻擊父親也。為兒者極願為父背過，不但如此，兒之死如有利於父親之大業之成功，亦必樂以為之。但今日內心中所感惶恐者，乃因兒之過反使父親受辱，如此則生不如死。<sup>115</sup>

1956-57年蔣經國日記共有12則談到胡適，多半都與《自由中國》「祝壽專號」對蔣中正的批評有關。第一則是有關《中央日報》刊登「祝壽專號」中胡適的文章〔按：此文在《自由中國》與《中央日報》同時刊出〕，<sup>116</sup> 使他非常氣憤，他說該社社長胡健中（1904-1993）比胡適還可恨：

《中央日報》在卅一日祝壽特刊，登載了一篇胡適所寫的〈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胡適一本其「自以為了不起而以能批評元首為號召的政客心裡」，對於父親在此文章之中加以譏評，我看了之

<sup>114</sup> 《蔣經國日記》，1954年8月16日。

<sup>115</sup> 《蔣經國日記》，1954年10月31日。這一天是蔣中正的生日，蔣經國很可能是藉這些話向父親表達忠誠。

<sup>116</sup> 《中央日報》的版本刪除了《自由中國》版本中「故事的後記」的第一段文字。被刪除的部分如下：「這兩個故事，據說都含有譏笑的意味。但我聽了只覺得這兩個故事都最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國元首的風度。做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軍隊的統帥，而能全權信任三個替他負全責的將領，不必接見第四個人，這是何等風度！一個第一流的軍人做了一個世界有名的大學的校長，而能自己承認沒有專門的知識，願意全權信任負責的首長，不敢輕易『糟塌了他們的寶貴光陰』，這是何等風度！做了世界第一強國的元首，遇着了自已一時不能決斷的問題，能夠自己不輕易下決斷，『請狄克替我挑一個罷』，這是何等風度」。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後非常氣憤，而《中央日報》竟將此文發表出來，更感痛心。胡適可惡，而胡健中則更為可恨，此輩無恥之徒實為當前之政治敵人，他們亦即是共匪之幫凶，不知有多少事在所謂「開明」、「民主」、「寬大」這許多美好的名詞之下，而使革命遭受到了莫大的損失，今日黨內有許多人中了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毒實在太深了，不在思想上覺悟過來，是無法與共匪鬥的。<sup>117</sup>

隔天，他看到李大明（1904-1961，美國華僑）建議政府要蔣經國交出特務機關並離開臺灣、《自由中國》「祝壽專號」中羅大年所寫的〈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批評救國團，以及《新生報》刊出胡適所寫〈論言論自由〉一文，他也發出類似的感嘆，認為這些作者比共匪還要陰險，《新生報》的編輯比胡適還要可惡：

李大明最近在美國發表反動言論，要求政府派蔣經國出國，並交出特務機關由政府清理，此種荒唐與卑鄙之說法，實不值一笑，又有所謂姓羅者，在《自由中國》之反動刊物發表文章，反對救國團的組織和在學校裡研讀三民主義和總統訓示，如此說法比共匪的直接宣傳還要陰險可惡，《新生報》於前日亦發表適之反動文章所謂〈論言論自由〉，<sup>118</sup> 胡適可惡，而《新生報》的人更可惡，難道還要把國家的命運斷送給共匪嗎？不！決不讓這些政治小丑抬頭，並且自己相信必能得勝。<sup>119</sup>

對於各方對蔣中正的攻擊，蔣經國一方面感到生氣，另一方面他決定以「周密之佈署」來「擊退這批共匪幫凶的進攻」。<sup>120</sup> 他的作法是發動同志予以辯駁：

近來為反對《自由中國》、《自由人》、胡適之之反政府言論，由政治部、救國團出面駁斥，實在是因為忠心耿耿為黨國，對於為匪宣傳之謬

<sup>117</sup> 《蔣經國日記》，1956年11月3日。

<sup>118</sup> 此文是金耀10月23日對胡適的訪談，〈胡適談言論自由〉，刊於《新生報》，1956年12月2日。內容亦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頁2554-2556。蔣經國可能在刊出之前即讀到有關此文之消息。

<sup>119</sup> 《蔣經國日記》，1956年11月4日。

<sup>120</sup> 《蔣經國日記》，1956年11月21日。

論，實在難以容忍，如再容忍，即無法立足，更無力反抗共匪思想之毒化政策，用意在此，而今後所要注意者，乃在於方法與態度之改進也。<sup>121</sup>

不過極有趣的是蔣中正並不贊成與胡適等人正面對抗，他認為蔣經國應「改變作法」，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父親根據目前的政治環境，當面告誡不宜出面與文人政客作對，現在各方面皆以我為打擊之目標，並將怨恨集中於我一身，故應改變作法，避免不必要的和無謂的誤解和攻擊，並須注意到事業的前途之開展。<sup>122</sup>

蔣中正甚至要求他改變對陳誠、胡適的不滿心理，而能與兩人合作。對於此一建議，他勉強接受，對陳誠「降心相從」，但對胡適他卻無法改變惡感，只能置之不理：

父親曾要求兒改變對陳副總統與胡適的不滿心理，為兒者深知父親作如此要求，實為了兒之事業與前途著想，並且非常正確，故數月來一方面深自反省，同時力求改變自己之心理，決以「降心相從」以待陳副總統。非為個人也，實為父親大業之完成也，並且自覺必須從心理上作根本之改變。目前雖稍帶「勉強」，但對陳之「相從」似有進步。但對於胡適則毫無改變之意，此一政客將來必與我黨為敵，不過在目前余必將以「不理」之態度以處之。<sup>123</sup>

蔣中正之所以了解蔣經國與陳誠及胡適之間的心結，主要是因為他曾仔細地批閱了蔣經國日記，甚至有時還會手批千餘字，這是父子兩人溝通的重要方式：

朝課後，續閱經兒去年日記，窮上午半日之力完畢，對其記事感念甚多憂慮，而其精神體力皆過於緊張，更為可慮。禮拜後記事，午課後，手批經國日記千餘字，猶覺未盡其言也。<sup>124</sup>

在1957年蔣中正日記之中對於蔣經國與陳誠之間的矛盾甚感擔憂。他說：

<sup>121</sup> 《蔣經國日記》，1957年3月2日。

<sup>122</sup> 《蔣經國日記》，1957年3月2日。

<sup>123</sup> 《蔣經國日記》，1957年4月14日。

<sup>124</sup> 《蔣中正日記》，1957年3月2日。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此時經國與辭修，如一有疑忌與矛盾不睦之情緒，則余一生為黨國之革命苦心經營之事業，必將因之一筆勾銷，故應嚴戒經國，對辭修必須尊敬將順，以輔助辭修，使能盡心繼吾黨領導重任，以完成余志則幸矣。<sup>125</sup>

這是他勸蔣經國與陳誠、胡適和解的重要原因。不過蔣中正在日記之中對於胡適仍十分厭惡，「胡適竟提『毀黨救國』之荒唐口號，不能再事容忍，對此種文人政客，不可予以禮貌優遇」（1957年1月12日）。但他也了解必須與胡適合作。1957年他決定任命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而且從7月開始就想到「胡適住所之準備」。他並交代蔣經國與李濟（1896-1979）聯繫，為胡適蓋一間宿舍，蔣經國也遵照指示辦理。「二時許訪李濟，談為胡適建屋事」、「午前約李濟同赴南港中央研究院看胡適新建之居所」。<sup>126</sup>

1958至1960年之間，蔣經國日記中有關胡適的記載不少，總共有近50則。1958年4月初，有3則關於《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從蔣經國日記來看，此事應該並不是出於他的直接指示，但是他很警覺地發現，很多人會猜想這與他所領導的救國團有關：

果不出我之所料，合眾社記者竟報導《胡適與國運》一書為救國團所印發，一般政客一定要無中生有，將一切不名譽的事歸罪於救國團，今日之政客無異於一群瘋狗潑婦，此時此地對他們以置之不理為上策，《胡適與國運》一案如不將真相查明，定將造成一種「救國團反自由反民主」之大罪。<sup>127</sup>

他覺得做這一件事情的人背後有一個很「聰敏」的「政治陰謀」，就是一方面嫁禍於救國團，另一方面使胡適猜疑政府，而達到「挑撥離間」的目的：

有人散發反胡適之小冊子《胡適與國運》，雖尚未查明究由何人所為，但可斷定為一種極其「聰敏」的政治陰謀，其目的在使人猜疑到此乃為救國團之反胡表示，而使胡之本人猜疑政府之態度，此種挑撥離間之作

<sup>125</sup> 《蔣中正日記》，1957年1月31日。

<sup>126</sup> 《蔣經國日記》，1957年7月27日、1957年11月4日、1958年4月5日。

<sup>127</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4月10日。

法，尤其對於氣量狹窄之胡適最易起效，對於胡某由於政治觀念之相背，以及對其政客作風之不滿，本無好感，但余既為政府方面的負責人之一，且為顧及父親之政治處境，余定將顧大局，對其採取「友善」之態度。<sup>128</sup>

蔣經國的估算完全正確，幸好不久就找到《胡適與國運》的作者，「反對胡適的小冊子已經被查明為臺大教授所寫，否則又將『加罪』於救國團了」。<sup>129</sup>

胡適返國之後，蔣經國參與不少相關的活動，如4月8日「二時半在機場接胡適之……四時半拜見父親，報告接胡適經過」。胡適就職典禮，蔣經國也參加了，但他仍然掩飾不住他的胡適的惡感，要在日記中發洩出來。他說：

聽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演講，發覺此人講話時神經緊張，並不像一個平心靜氣的學者，而是心情暴躁、假裝正經的政客，對於年近七十之有名學者，余本不敢置評，但心有所感且記之，以待來日的事實之證明，同時以別人為例，決不可犯言行不一之病，否則終生痛苦，難以自處。<sup>130</sup>

在1958-59年之間，他的日記環繞著以下幾點：第一批評胡適與雷震的結合，形成一股反政府的力量：

胡適之、雷震之類已經合流，成為一種反動的力量，此亦為革命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有革命即有反革命，有反共即有破壞反共者，故不足為奇，問題是在於我們本身能否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奮鬥到底。胡適的政客真面目已經逐漸暴露出來了，他的「命運」亦將斷送於此矣。

胡適稱雷震為英雄、好漢與鬥士，正是可恥亦可笑，胡適之無人格與卑賤，亦由此可知矣，這塊破招牌被人利用來作「男盜女娼」之政治買賣，其臭無比，政治上之小丑小偷有如雷震者，今日得意狂妄，殊不知此乃為其敗壞之預兆也。

胡適曾提議為雷震在臺北造銅像，胡適幼稚乎？神經病乎？小政客的真

<sup>128</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4月6日。

<sup>129</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4月8日。

<sup>130</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4月14日。

面目之暴露乎？總之胡適竟作如此之主張，可以斷定胡適之從此完矣。雷三毛受寵若驚，得意忘形，希臘人說得好，「上帝要毀滅一個人，一定先要使其發狂」，雷、胡的狂妄，必有其應得之惡果也。

雷震此賊又在《自由中國》發表其最反動與荒唐之言論，破壞政府，侮辱父親，其手段之陰險惡毒與共匪無異，讀之至為憤激，總有一天將起而除此危害黨國之惡棍，不過今天尚非其時也。……雷震之後台是胡適……臺北各報又是盲目的捧胡適，以為這是「趕熱鬧的場面」，此種沒有骨氣的作法，是在為共匪製造機會，豈不可痛乎？<sup>131</sup>

第二，胡適與陳誠的關係。陳誠想藉著胡適來拉抬自己的身價，因此努力促成國民黨與胡適的和解。蔣經國對此不以為然，卻又不得不參加。上文曾談到1958年5月26日陳誠邀請胡適、陳雪屏、蔣經國面談，對於胡適的批評，蔣經國當時「未發一言」。他在日記中表達了他的想法：

陳誠約余與胡適之在其寓所「長談」，余本不欲前去，因為此種「解釋性」的談話是徒費光陰而已，我不想轉移胡適之的頑固觀念，一樣的胡適之亦難以轉變我的觀念，陳誠「召宴」又不可不去，前往談至子夜始散，果不出所料，徒費時間而已。

胡適在陳副總統官邸對余表示：一、蔣總統第二任期滿後，不可用任何方式再連任之；二、中國國民黨對於國家有害無益，不宜存在；三、軍隊之人數應力求減少；四、出版法之提出為違背時代之舉。以上四點意見之出發點，皆在破壞由父親所領導之反共中心，胡適之所謂不談政治，即是談政治之另一方式；胡適不要別人注意到黨的問題，而自己則積極的鼓動組織在野黨；胡適要求言論自由，誰批評政府誰就是民主鬥士，而在市面上發售反對胡適之小冊子，則大怒而責備政府不加禁止。如此政治風度，殊覺可笑也，假的可以當作真的來看，好人反被看作壞人，這是今日社會現象的特徵也。<sup>132</sup>

<sup>131</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6月7日、1958年6月8日、1958年6月13日、1958年12月19日。

<sup>132</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5月28日、1958年6月7日。

蔣經國不但對陳誠拉攏胡適的作法表示不滿，對於國民黨內捧胡的人如陳雪屏（胡適在北大的學生）、王世杰、羅家倫等也加以批評。他說：「本黨副總裁與陳雪屏稱胡是『領導人物』，稱『胡』為『老師』，如此是非不明的狀態，將何以談革命耶？何以來對付敵人耶？」；「在會報上余雖未指陳雪屏之名，但很明顯的是指此黨內之內奸陳雪屏而言，說明他如何私通雷震與胡適共謀毀黨之計」。<sup>133</sup> 1958年7月陳誠擔任行政院長，要請陳雪屏任行政院秘書長，蔣經國認為陳誠就是想要藉著胡適來鞏固自己：

陳誠聞將任命陳雪屏為行政院秘書長，再與其他事實相對照，似有「借胡適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想法，這是政治上的一種危機。陳誠應當有所覺悟者，即今日有許多所謂反政府的自由民主人士在捧他，並不是佩服他，而是在利用他，作為分化我內部之用。陳如不能瞭解此點，而得意忘形，必將大上其當，毀己毀黨。近日來靜察政局，憂慮無已，余甚望陳副總統有所成功，因為這是父親的意思，無論如何，余必將盡自己的力量來幫助陳副總統之事業成功，因為這是合乎黨國的利益，不顧別人如何待我，我則待之以誠，做人之大道也。<sup>134</sup>

1959年1月陳誠與北大派學人南下避壽事件，以及行政院撥款2千萬元給中央研究院等事，他也覺得陳誠是與胡從事「政治交易」，兩人「相互利用」：

陳副總統去中南部避壽，帶胡適、王世杰同行，同時行政院正式宣布撥二千萬給胡適作研究費，在此種政治活動的背後隱藏著極大的危機，陳、胡在互相利用，今後受害者是陳而非胡，一個離開了政治立場而去遷就別人者，沒有不失敗的，一面口口聲聲擁護總統，一面則勾結反總統的人，如此矛盾作法，如何不使人鄙視而怨恨。今日陳之還在高呼擁護總統，其目的在於騙得黨內一部份人士之贊助，而在事實上則存在有不可告人之政治野心，一個自以為是，被人捧得上天而覺得非他不可的人，到最後來非失敗不可，吳國楨，孫立人，今日安在耶？

陳誠近來常在各種會議上發牢騷，失態之處甚多，最近以發展科學的名

<sup>133</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12月19日、1959年1月27日。

<sup>134</sup> 《蔣經國日記》，1958年7月12日。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義，行政院發給中央研究院（胡適）台幣二千萬元，美金二十萬元，這明明是一筆卑鄙的政治交易，而陳誠又怕別人對此事有所批評，所以在行政院會議上宣布，中央研究院是總統府的機構，這筆研究費是總統批准的，此種政治上的卑賤作法，不但令人寒心，而對其人惡恨之念又生矣。<sup>135</sup>

他有時不直接說陳誠等人的名字，而只說擔心黨內的野心家與胡適等政客相勾結，他們企圖依賴美國勢力來打倒蔣中正：

反動力量由共匪背後之策動，以胡適為首的行動，已內應外合，企圖依賴美國，假借反共口號，結成集團，對抗我父親所領導的反共革命政府，以達成彼等之卑鄙政治慾望，相信我們必能戰敗此類下流的反動力量，所可憂者乃是黨的野心家在勾結此批政客也。<sup>136</sup>

對於蔣經國與胡適之間的矛盾，當時也有學者發現，並勸蔣經國與胡適和解。例如錢穆（1895-1990）建議他邀請胡適至青年會演講，以避免「政治上之孤立」，蔣經國在思考之後仍決定不邀請胡適，因為此舉違背了他的根本原則：

錢穆先生向我建議邀胡適赴青年會講演，以免各方面之誤會，以形成政治上之孤立，對錢先生之厚意深表感激，經再三考慮之後，決定不邀胡講演，在反共鬥爭中，思想問題至為重要，任何的政治運用一旦違背了原則，拋棄了立場，那麼這種行為必定是自私的、反革命的。<sup>137</sup>

由此可見蔣經國所堅持的政治理念與胡適完全不同，他可以在表面上容忍胡適，但在思想上卻不願與之妥協。

蔣經國在1959年底至1960年日記中有關胡適的部分主要涉及蔣中正的「三連任」，以及雷震案。在「三連任」方面，1959年10月，蔣經國記載：

胡適自美回國，即公開表示反對總統連任，近日來並向各方面活動，反對修憲，反對連任，彼以護憲為名，而作政治「買賣」，是實在他的心

<sup>135</sup> 《蔣經國日記》，1959年1月18日、1959年1月9日。

<sup>136</sup> 《蔣經國日記》，1959年1月2日。

<sup>137</sup> 《蔣經國日記》，1959年2月7日。

目中根本沒有國家，而以滿足其私慾為目的，乃是掛學者的招牌，從事於政客的活動，不過在此時此地，對於這些政治上的小人，還是不要去同他們作對為是。<sup>138</sup>

後來蔣中正順利地透過王雲五（1888-1979）、蔣夢麟（1886-1964）等人說服了胡適，完成了三連任。隨後他即進行對於雷震與《自由中國》的整肅活動。1960年9月至10月，蔣經國日記中有4則與雷震案有關。第一則是在9月10日，他記載胡適在美國對雷震的聲援，宣稱雷是「愛國反共者」，並說美國官員亦他的觀點。蔣經國對此甚感憤怒，因此夜不成眠：

胡適在美談雷案，稱雷為愛國反共者，要求司法辦理此案，在外電中暗示美國官員同意他的看法，此種借外力以自重的政客，奸賊也，讀胡之聲明，又激起余之憤怒，想到國難如此嚴重，而內賊又如此之多，各種隱憂又如此之多，為之而夜夜不得安眠，吾何以如此容易激動而不能自制耶？<sup>139</sup>

10月4日，雷案公開審判後，蔣經國在日記中說明父親果斷的行動是因為雷案乃國民黨與反動派的生死鬥爭，又說胡適等人崇洋媚外，是反共抗俄時期的「汪精衛」、「新漢奸」：

雷案公開審判之經過良好，可知真理是永存的，雷案乃是本黨與反動派的生死之鬥，如非父親之大無畏精神，今日黨內無一人敢負此重大責任的，亦無人真能瞭解此一問題之嚴重性。今日如不將此毒瘤割除，則我反攻之基地，不上兩年必將為此毒瘤而崩潰。父親在三中全會再三強調自立精神之重要，以及洋奴們媚外態度的危害國家之嚴重性，胡適、張君勱、左舜生之類，乃是反共抗俄時期的「汪精衛」也，岳軍先生對雷案之態度亦不夠明朗與堅定。<sup>140</sup>

10月20日「聞胡適將於明日返國，他在今日的政治上除了能扮演一個『新漢奸』的角色外，再不可能有其他的作用了」。<sup>141</sup> 10月28日，他又記載：

<sup>138</sup> 《蔣經國日記》，1959年10月30日。

<sup>139</sup> 《蔣經國日記》，1960年9月10日。

<sup>140</sup> 《蔣經國日記》，1960年10月4日。

<sup>141</sup> 《蔣經國日記》，1960年10月20日。胡適於10月22日抵達臺北。

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

胡適回國之後，對於雷案以及反對黨問題發表反動言論，在行動上則與流氓政客混在一起，其言之卑鄙，令人憤恨，此人到此完矣，他的所有底牌都已翻出來了，不必重視他，亦不必得罪他，讓他自己來毀滅自己，這是又一型的中國「讀書人」之下場。<sup>142</sup>

10月31日為蔣中正七秩晉四華誕，中午蔣經國為父親祝壽，在長安東路的寓所辦了一席壽宴。胡適也應邀參加。<sup>143</sup>這是他返國之後第一次與蔣氏父子見面，因為場合的關係，壽宴上應該沒有機會談到雷案。他在11月18日與蔣中正正式見面時才觸及此一課題。會談之中胡適雖為雷震說情，然仍明白表示「我願意用我道義的力量支持蔣中正先生的政府」，「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那兒去！」<sup>144</sup>雷震案覆判確定之後，臺灣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民主力量受到莫大的打擊。胡適對此也只能用「大失望，大失望！」（1960年11月24日）<sup>145</sup>表達內心的痛苦。

雷案之後有一年多的時間，蔣經國日記都沒有再提到胡適。1962年2月，胡適才再度出現。2月6日，「訪王叔銘與胡適」；2月26日「弔胡適之喪」。誠如上文所述，當天早上蔣經國八點多就前往臺北殯儀館行三鞠躬禮，並瞻仰遺容，還向胡夫人致意，勸胡夫人節哀順變，保重身體。不過還是有些人對他不滿，「聞外有傳言說，我未於胡適死的那一天去弔喪，乃是因為我不同意胡之思想，以及恨胡破壞救國團的原因，豈不可笑乎？天氣轉寒，冷熱無常，情緒亦至感不安」。<sup>146</sup>對於胡適的過世，他有兩點感想。首先，3月2日「胡適死後，地方反動份子發動各方面的人去弔喪，以示『聲勢』，死人亦可利用也」。其次，3月10日他寫到：「胡適死了，對於死者從來不說什麼的，這是我一貫的為人之道，但是由於臺北報章編造事實，奉胡為聖人（《中央日報》亦不例外），不得不說

<sup>142</sup> 《蔣經國日記》，1960年10月28日。

<sup>143</sup>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於總統蔣中正七秩晉四華誕設宴祝壽」（1960年10月31日），〈蔣經國照片資料輯集—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年〉，《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30204-00005-014。

<sup>144</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668。

<sup>145</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680。

<sup>146</sup> 《蔣經國日記》，1962年2月27日。

今天的文化報界是如何的沒有立場、沒有人格，可悲可嘆矣。」<sup>147</sup>

1962年之後，蔣經國日記只有幾則零星的記載。1963年2月24日「參加胡適逝世週年紀念會」；1968年1月31日「向【江】良規、【湯】惠蓀二友之遺屬以及胡適之夫人賀新年。」1975年9月2日，「弔胡適夫人之喪」。

從蔣經國日記之中有關胡適的記載可以看出：第一，蔣經國從1949年至1962年對胡適的態度來看，他都保持著在公開的場合對胡適十分恭敬，即使面對胡適對他的批評（特務頭子、殘暴、共產黨的作法），他也只是「一言不發」。不過在日記之中卻對胡適十分不滿，他所用的詞彙包括「反政府」、「反動」、「反革命」、「反領袖」、「狂妄」、「無人格與卑賤」、「言行不一」、「亡國的罪人，是國家的敗類」、「沒有國家觀念，而又是一心想做官」、「心情暴躁、假裝正經的政客」、「是一隻買空賣空的紙老虎，是一個十足的小政客」、「以『民主自由』為招牌，而作不正當的政治買賣」、「借外力以自重」、「汪精衛」、「新漢奸」等。他最為痛心的是黨內的一些人卻尊稱他為「領導人物」，想與他勾結，報紙媒體甚至尊奉胡為「英雄」、「聖人」。從上面的評估可以看出來，蔣經國肯定「俄國模式」的「黨國思維」在1962年胡適過世之前都沒有改變。<sup>148</sup>

第二，從蔣氏父子對胡適的態度可見，兩人都秉持「一黨專政」的黨國思想，對胡適「毀黨救國」的想法不以為然，不過蔣經國攻擊性較強，蔣中正的城府則較深、容忍性較強，思慮也較周密。他對經國的訓示使經國對胡適的反擊行動變得較為婉轉，甚至考慮採取較為「友善」的態度（1958年4月6日）。這些來自父親的訓示與蔣經國後來放棄「一黨專政」、接受胡適的想法有一定的關聯。

<sup>147</sup> 《蔣經國日記》，1962年3月2日、10日。

<sup>148</sup> 一直到1978年底，蔣經國在面對美國斷交、中共統戰和黨外挑戰之時，仍具有很強的黨國意識。1978年12月6日的日記，他說「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的基本政策……絕不讓反對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救黨之要道」。引自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65。

## 肆、結論

胡適比蔣經國大19歲，兩人分屬不同的世代。胡適視他為後輩，蔣經國則禮敬他為父執輩。1949至1962年間，蔣經國與胡適的交往有幾個作用。第一，蔣經國代表蔣中正總統，在重要場合公開歡迎、接待胡適。第二、蔣經國代表蔣中正總統與陳誠、胡適等人共議國事，並向總統報告這些人的動向，以及在日記中表達對他們的觀感，讓父親了解他的想法。第三、作為情治機關的頭子，他負責監視、管控胡適、雷震等自由主義者與其他異議分子，並對其「不當」言論做出反擊。

從兩人的交往可見，蔣經國一直維持「表裡不一」的狀況，表面尊敬，暗中批評。直到1962年胡過世之時，他在思想上仍然不肯定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的自由民主理念。如果放在中華民國政治轉型的過程之中來看，我們要如何解釋蔣經國與胡適的關係呢？有一種解釋認為胡適對蔣經國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換言之，蔣經國晚年的「民主化」是1962至1988年之間各種局勢所促成的。胡適死後，他對蔣經國的影響也隨之消失。

筆者承認此一可能。然而我們或許可以思考另一種可能，亦即胡適所代表的思想趨向或許在蔣經國思想之中逐漸起了作用，而成為促成蔣經國走向民主化的一個原因。筆者的想法是基於以下的思考。首先，胡適雖然死了，但胡適的思想沒有死，蔣經國晚年所針對的政治改革的挑戰，絕不只是針對胡適一人，而是包括經過胡適「思想動員」之後，受其影響的自由主義者、黨外運動的支持者、民進黨的創黨元老等後繼者。此一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所做的前仆後繼的努力，對蔣經國來說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

從蔣經國的經歷來看，1965年他擔任國防部長、1970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當行政院長，從幕後開始走向台前，政治改革的壓力逐漸加大。此一「大的轉彎」（余英時語）在他與胡適交往之中看不出來。然而下面兩個國內與國際性的結構因素扮演了關鍵角色。

第一、中華民國的民主基因：1948年中華民國進入憲政階段，在體制上是民主共和國。這一憲政體制雖因內戰，國大代表依照憲法第174條第1款制訂《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再由總統頒布「戒嚴令」。然在性質上，此一條款為臨時之修正性質，「俟戡亂終了，自然消滅」，因此在此時期「戡亂與憲政同時並進」，以「建立戰時體制」與「維護憲政體制」。<sup>149</sup> 1949年之後此一體制不僅透過法律條文、地方選舉來維護，也透過胡、雷等自由主義者、參與籌組新黨的臺灣政治人物，以及國民黨內親胡適的自由派人士所共同維繫。上文曾談到1953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圖書室不讓《青年戰士報》的激烈反胡、反自由主義的言論「供人公開閱覽」。以及《中央日報》，《新生報》、《公論報》等刊登胡適支持「言論自由」、「反對黨」的文章。這些事情讓蔣經國很不滿意，然由此可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觀念在戒嚴體制之下仍有一定的支持者與思想上的合法性。這也是胡適返國時的演講能風靡一時的重要原因。他們在胡適的言論中感受到世界大勢之所趨與未來的希望。

第二、美國民主陣線的國際因素：胡適了解國際局勢對臺灣生存的重要性，臺灣必須要在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之內，才可能自保與反共。吳國楨案爆發後，他為了降低此案對臺灣的衝擊而影響到美援，他用「自由」來為臺灣辯護，並以「亞洲的麥卡錫」說明蔣經國之所以採取類似「警察國家」、「共產黨的作法」有其必要，甚至還得到部分人們的支持，如此臺灣才得以繼續留在以美國為首的反共陣營。美國方面也同樣地了解臺灣的戰略地位與重要性，他們多次邀請蔣經國訪美，也是希望能逐漸改變蔣經國的想法。

上述兩個結構性的因素與兩個人為的因素結合在一起。第一是蔣中正的角色：蔣中正無疑是一個威權統治者，他一心想採取承襲自孫中山「聯俄容共」的「俄國模式」來對抗中共，又藉著雷震案樹立權威，清除自由主義者的影響力。但是他很清楚，為了蔣經國未來的「事業與前途著想」，蔣經國必須「改變對陳副總統與胡適的不滿心理」，要「在奮鬥中少樹敵人」，並與反對他的人「友善」、「相從」。蔣中正本身也做了很好的示範，能夠與胡適合作，做到「道不同而相為謀」。這個傾向對蔣經國有很重要的啟示。

---

<sup>149</sup> 「黃少谷呈蔣經國為檢具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研究資料一種恭請鈞閱」（1978年6月19日），〈國家安全會議簽呈（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00010-006。

第二個人為的因素是蔣經國的性格，尤其是他的愛民理念與對反對者的容忍、溝通的心態。他長期受俄國的影響，因此有人懷疑他是「俄國共產黨員，迄今仍未脫黨」（見1959年2月7日日記），或懷疑他的妻子是「俄國特務」（見1958年5月30日日記），認為他很可能跟中共和談（與周恩來秘密接頭），使臺灣赤化。<sup>150</sup> 這些應該都是對他的誤會。在性格上，他深受父親「忠黨愛國」觀念的影響，希望能實現他父親反共復國的志業，也具有來自傳統的親民、愛民的觀念（民本觀念）。他一直抗拒胡適的自由主義，但是出於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的使命感，能夠維持對胡適的尊重。晚年時，他面對各方的壓力，毅然做出「民主化」的抉擇。對於蔣經國內心的矛盾與掙扎，吳乃德先生說得很好，他批評蔣經國是一個「獨裁者」，可是在形勢比人強的時候，他願意屈服，讓臺灣的民主轉型能夠在平靜中完成。<sup>151</sup>

上述的因素都直接、間接地促成蔣經國後來的轉變，此一過程是從「表裡不一」，後來「表」的一面逐漸增強而改變了「裡」，最後是「表裡一致」。這一個過程也是有些人所說的臺灣的民主化是「假戲真做」。<sup>152</sup> 然而很可惜的是他的日記只寫到1979年，我們無法對他在1979-1988年之間的心理狀況有更多的認識，來解答本文的核心問題，亦即他如何從情報頭子，成為威權體制轉型的開創

<sup>150</sup> 1957至1959年間，尤其是1958年八二三砲戰前後，曹聚仁等人向胡適、蔣經國、黃少谷、俞大維、陳誠寫信，代表中共領導人主動發起的和平試探。這一舉動使人猜測臺灣與中共進行秘密和談。例如1957年2月9日，香港的《新晚報》報導「周恩來與蔣經國正接頭？和談之說滿天飛」。2月16日該報又報導兩岸在瑞士會談，條件是「蔣介石變成副主席和自治臺灣的主席」，以及臺灣退出聯合國，兩岸共推一代表。「香港新晚報：周恩來蔣經國正接頭？」（1957年2月9日）、「香港新晚報：和談之聲遍港九有人提出條件來傳蔣可任副主席兼主管臺灣」（1957年2月16日），〈民國四十六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401-00012-008。參見楊天石，〈蔣介石日記中的「兩岸密使」〉，收入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四）》（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頁457-481。

<sup>151</sup> 吳乃德，〈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收入國史館編，《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467-502。

<sup>152</sup> 例如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258。此外也有人從法律史的角度指出，假戲的開始是專制的獨裁者還是要取得形式合法性，最後變成「真做」。法操司想傳媒，〈臺灣民主：假戲真做的結果？〉，收錄於「法操FOLLOW」：<https://follow.tw/topic/display/2243>（2023/4/1點閱）。

者？以及民主化的奠基人？如何從抗拒美國式自由民主體制，到「被迫」地接受此一世界潮流？不過從國史館的檔案可以看到，他在1978年6月（美麗島事件之前）已經請黃少谷研究《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法理基礎與30年來四度的修訂過程。<sup>153</sup> 這與後來的「解嚴」應該有一定的關聯。根據宋楚瑜的口述，「經國先生在73年（1984年）5月20日連任總統起，就將施政中心放在政治改革上」、「經國先生自73年（1984年）起已有解除戒嚴之心」。<sup>154</sup> 葛光越也說「民國73年我接任武官時，經國先生就已經準備解除戒嚴了。他不斷跟黨內人士溝通，主動說服他們，化解他們的疑慮」。<sup>155</sup> 蔣經國的民主化無疑是一個不斷依據時勢而調整的過程。

筆者認為胡適等人的理念在蔣經國的心中或許是一股一直想要將之壓抑下去的力量，可是他發現「形勢比人強」，尤其是反對力量的逼迫是無法抗拒的，最後才與之妥協而促成威權政治之轉型。換言之，蔣經國在此激盪下從親蘇、反美、支持威權體制的情報頭子，吊詭地成為民主化的推手，使臺灣最終實踐了胡適的自由民主理念。「道不同而相為謀」不但表現在蔣中正總統與諍友胡適之間，也表現在蔣經國順應時代、尊重體制而將胡適、雷震的理想付諸實際，締造了一個民主的中華民國之上。臺灣的民主化證明：勝利最後屬於「有思想、有抱負」的胡適、雷震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

---

<sup>153</sup> 「黃少谷呈蔣經國為檢具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研究資料一種恭請鈞閱」（1978年6月19日），〈國家安全會議簽呈（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6-00010-006。

<sup>154</sup> 〈宋楚瑜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上冊）》，頁94、120。也可以參見他所寫的英文專著，James Soong, *The Inside Story of Taiwan's Quiet Revolu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Open Democrac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22).

<sup>155</sup> 〈葛光越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530。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蔣經國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
  - 〈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二十九）〉。
  - 〈蔣中正致宋美齡函（七）〉。
  - 〈蔣經國家書（三）〉。
  - 〈蔣經國家書（四）〉。
-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一）〉。
  - 〈民國四十三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二）〉。
  - 〈民國四十六年蔣經國言行剪輯（二）〉。
  - 〈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四）〉。
  - 〈國家安全會議簽呈（四）〉。
  - 〈蔣經國訪美期間電文暨報導及陳誠訪美會談資料〉。
  - 〈蔣經國照片資料輯集—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年〉。
  - 〈蔣經國演講稿（十八）〉。
  - 〈蔣經國演講稿（三十一）〉。
- 「李樸生與陳克文往來書信」，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先生提供。

### 二、史料彙編

-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7、10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
-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9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11、1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 張其昀，《質樸堅毅：張其昀日記（1949-1950，1952）》。臺北：開源書局、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
- 傅正，《傅正日記》，第9冊。新北市：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9年。
-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雷震，《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38、39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
- 雷震，《雷震秘藏書信選》，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0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
- 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
- 殷海光，《殷海光全集第10冊：政治與社會（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
- 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 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年。

### 四、雜誌、報紙

- 《大華晚報》，臺北，1954年。
- 《公論報》，臺北，1952年。
- 《中央日報》，臺北，1954年。
- 《中國一周》，臺北，1955年。
- 《自由人》，香港，1956年。
- 《自由中國》，臺北，1951-1952、1955、1959年。
- 《直報》，香港，1954年。
- 《青年戰士報》，臺北，1953年。
- 《新生報》，臺北，1956年。
- 《聯合報》，臺北，1954、1958年。
- 《聯合評論》，香港，1959年。

## 五、專書

- 任育德，《胡適晚年學思行止研究（1948-1962）》。臺北：稻鄉出版社，2018年。
-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
- 朱光漢（徐子明）、李博愛（李煥燊）等，《胡適與國運》。臺北：出版者不詳，1958年。
- 江勇振，《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臺北：暖暖書屋，2022年。
-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 艾森豪著，張北海、黃麟佑譯，《歐洲十字軍（*Crusade in Europe*）》。臺北：世界書局，1953年。
-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21年。
- 金匱緯，《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7年。
- 張友驊，《綁架蔣經國！？情治首長的背叛與奪權之爭》。臺北：暖暖書房，2022年。
-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 野島剛，《最後的大隊：蔣介石與日本軍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 陳昭瑛，《徐復觀的政治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
- 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年。
-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
- 黃清龍，《門裡還是門外？從蔣經國日記再探孝嚴身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2年。
-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四）》。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 顏擇雅編，余英時著，《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新北市：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22年。
- Soong, James. *The Inside Story of Taiwan's Quiet Revolu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Open Democrac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22.

##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吳乃德，〈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收入國史館編，《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臺北：國史館，2004年。
- 林孝庭，〈蔣經國與宋美齡關係再探究——以《蔣經國日記》為中心〉，《臺灣歷史研究（北京）》，2022年第4期。
- 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紀錄〉，《近代史研究（北京）》，第182期（2011年3月）。
- 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著，《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 黃克武，〈評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4期（2021年12月）。

## 七、網路資料

- 法操司想傳媒，〈臺灣民主：假戲真做的結果？〉，收錄於「法操FOLLOW」：<https://follow.tw/topic/display/2243>（2023/4/1點閱）。
- 林孝庭，〈蔣經國的一九六四：日記中的國事與家事〉，收錄於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https://presidentialcck.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article/PATA00024>（2022/11/25點閱）。
- 胡適，〈共產黨統治之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https://www.hushihevent.com/%E8%83%A1%E9%81%A9%E7%9A%84%E8%A6%8B%E8%A7%A3>（2023/1/5點閱）。
- 謝孟穎，〈「蔣經國就是白色恐怖元凶」受難家屬揭歷史黑幕：所作所為並非為了臺灣〉，收錄於「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202894?page=1>（2022/11/25點閱）。
- 羅立邦，〈遠見民調「哪位總統對臺灣貢獻最大」他遙遙領先、第二名看不到車尾燈〉（2019年10月25日），收錄於「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871975>（2022/11/14點閱）
- “Nominating Group Rejects Chiang’s Plea to Retire,” Evening Star, February 15, 1954.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 of Congress.* Accessed November, 14, 2022.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45462/1954-02-15/ed-1/seq-6/>.
- Earl H. Voss, “Far East Leadership: Government by Committee Likely to Follow Chiang Kai-shek,” Evening Star, April 4, 1954, Page A-31.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 of Congress.*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45462/1954-04-04/ed-1/seq-31/>. Accessed November, 14, 2022.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45462/1954-02-15/ed-1/seq-6/>.